

全球对话

10.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17种语言刊出

与 Raquel Varela 谈社会学

Christine Schickert

阿雷格里港的 第四期ISA论坛

Geoffrey Pleyers, Jacob Carlos Lima,
Hermílio Santos, André Salata, Emil Sobottka,
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Gustavo Conde Margarites,
Priscila Susin, 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Lucas Pereira Wan Der Maas,
Izabelle Vieira

欧洲国家的 社会政策

Maria Petmesidou, Ana Guillén,
Emmanuele Pavolini, Daniel Clegg,
Roland Atzmüller, Sigita Dobyte,
Aroa Tejero, Silke van Dyk,
Tine Haubner, Beatrice Carella

数位化的挑战

Paola Tubaro, Lévio Scattolini,
Felix Sühlmann-Faul, Srujana Katta,
Kelle Howson, Mark Graham

理论观点

Donatella della Porta

悼念 Samir Amin Immanuel Wallerstein

Vishwas Satgar
Sari Hanafi, Stéphane Dufoix,
Frank Welz, Anand Kumar

开放论坛

- > 移民露营车的迁移策略
- > 纽约水牛城:难民安置的典范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0卷 / 第1期 / 2020.04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在本期的访谈中，劳动历史学者Raquel Varela回顾了发生于1974年4月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他探讨了为何要「由下而上」述说世界的重大事件、讨论劳动阶级的视角及贡献，并提及革命残留在葡萄牙的社会及经济影响。

在2020年7月，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者及社会科学家将齐聚巴西阿雷格里港，参加第四届国际社会学学会 (ISA) 论坛，讨论彼此的研究，以及21世纪社会变迁的四大挑战：民主、环境、不平等、交集理论。论坛会长Geoffrey Pleyers在他的文章中强调分析这些社会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巴西社会学学会 (SBS) 会长Jacob Carlos Lima向大家简介该社会的历史，并吁请社会学界，在面对当前该国政治发展及衍生的社会困境，能够互相支持及团结。来自论坛在地组织委员会的Hermílio Santos、André Salata和Emil Sobottka，以及六位巴西年轻学者，向我们简介了巴西历史及社会学。

基于近年欧洲福利制度的系统性的崩坏，新型态的社会政策被设置，并且不仅在特定领域挑战了不同国家，还挑战了欧洲和欧盟的社会支柱。在首次针对此议题的座谈会上，学者们展示了他们对当前轨迹、欧洲国家面临的挑战所做的研究。

第二场座谈会讨论了这个世代最重大的议题之一：数位化社会，检视它对劳动、金融市场的影响及其永续性。座谈会上也提到研究者如何对平台经济在维护、创造工人权利及合理的工作条件上做出贡献。

Donatella della Porta在他的文章中铺排了当前社会运动相关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世界各地持续进

行中的抗议活动，将新问题放进了讨论议程中，但也要求用新的方式去分析它们。他主张将资本主义和阶级重新作为分析范畴，带入社会运动研究中。

两位重要的社会科学及政治思想学者，Samir Amin (1931-2018)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2019)，去世了。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练和批判，Amin的战略构想影响了全球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科学学者。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分析概念深刻地丰富了社会学理论。作为ISA前任会长，他在新旧成员之间建立了蓬勃的交流，影响远至今日。这两位杰出人士的同事及朋友们会牢记并荣耀他们的成就及人生。

开场的两篇文章处理美国的移民问题：Veronica Montes研究了所谓的「移民大篷车队 (migrant caravan)」，成为那些希望从拉丁美洲移民到北部的人所采取的策略性选择。Aysegül Balta Ozgen向我们介绍了美国中型城市 (如纽约州水牛城) 的难民重新安置所带来的挑战及效益。 ■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对话以17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 投稿来信寄给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Assistant Editors: 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编：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Michael Burawoy.

媒体顾问：Juan Lejárraga.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区域编辑

阿拉伯：(Tunisia)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Algeria)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i; (Morocco)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 (Lebanon) Sari Hanafi.

阿根廷：Alejandra Otamendi, Juan Ignacio Piovani, Martín Di Marco,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US Rokeya Akhter, Juwel Rana,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Muhaimin Chowdhury, Helal Uddin, Md. Eunus Ali, Mostafizur Rahman, Jhulik Saha, Maria Sardar, Tahmid Ul Islam.

巴西：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Lucas Amaral Oliveira,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法国/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印尼：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Faezeh Khajehzade.

日本：Satomi Yamamoto.

哈萨克：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波兰：Adam Müller, Jonathan Scovil,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leksandra Wagner, Sara Herczyńska, Monika Helak, Aleksandra Senn, Weronika Peek, Anna Wandzel, Zofia Penza-Gabler, Justyna Kościńska, Iwona Bojadziewa.

罗马尼亚：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Bianca Mihăilă, Alexandra Mosor, Mioara Paraschiv, Maria Stoicescu.

俄罗斯：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台湾：李宛儒, 林玟圻, 吕道咏, 洪柏胜, 黄昱闵.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第四期ISA社会学论坛将在2020年七月于巴西阿雷格里港举办。论坛会长Geoffrey Pleyers、巴西社会学协会会长Jacob Carlos Lima、当地组织委员会以及六位年青学者将会带我们深入地了解巴西的社会学。



由于欧洲社会福利国家系统性地解体，欧洲国家的社会政策已成为社会学研究以及政治行为的关注焦点。在这场讨论会所涵盖的文章中，研究者将呈现欧洲福利国家如今面对何种挑战、其有何发展轨迹。



数位化将会、且正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此部分的文章检视了数位化对于劳动、商业市场、永续性的影响，也探讨研究如何能帮助平台经济的劳工维系其权利以及公平的劳动环境。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赞助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2	南欧对家庭政策的支持 Sigita Doblyte, Aroa Tejero, 西班牙	32
> 谈论社会学			
葡萄牙革命的遗绪: Raquel Varela 访谈 Christine Schickert, 德国	5	德国的志愿服务: 做善事还是影子经济? Silke van Dyk, Tine Haubner, 德国	34
> 阿雷格里港: 第四期ISA社会学论坛			
21世纪的四大挑战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时	8	欧盟会维持其社会支柱吗? Beatrice Carella, 义大利	36
当SBS迎来ISA论坛 Jacob Carlos Lima, 巴西	11	> 数位化的挑战	
简评巴西社会学界 Hermílio Santos, André Salata, Emil Sobottka, 巴西	13	人工智能是「谁的智能」? Paola Tubaro, 法国	38
制度化童年的叙事 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巴西	15	新奇博物馆 Lévio Scattolini, 巴西	40
社会救助作为政府部门: 巴西的案例 Gustavo Conde Margarites, 巴西	17	永续数位化社会需要什么? Felix Sühlmann-Faul, 德国	42
愉港女性的都市居住抗争 Priscila Susin, 巴西	18	公平工作组织: 零工经济的行动研究 Srujana Katta, Kelle Howson, Mark Graham, 英国	44
巴西勒西菲市针对暴力行为的非正式治理 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巴西	20	> 理论观点	
巴西的职业不平等 Lucas Pereira Wan Der Maas, 巴西	22	资本主义、阶级、争论 Donatella della Porta, 义大利	47
里约热内卢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 Izabelle Vieira, 巴西	24	> 悼念	
> 欧洲国家的社会政策		向非洲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Samir Amin致敬 Vishwas Satgar, 南非	51
经济紧缩: 医疗照护的普世性原则会被妥协吗? Maria Petmesidou, 希腊, Ana Guillén, 西班牙, Emmanuele Pavolini, 义大利	26	I. Wallerstein: 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知识份子 Sari Hanafi, 黎巴嫩, Stéphane Dufoix, 法国	53
新零工纪元的失业救济金 Daniel Clegg, 英国	28	I. Wallerstein: 使社会学重新团结 Frank Welz, 奥地利, Anand Kumar, 印度	55
走向对立的社会: 当社会政策开始注重主体性 Roland Atzmüller, 奥地利	30	> 开放论坛	
		移民露营车在中美洲的迁移策略 Veronica Montes, 美国	56
		纽约州水牛城: 实践难民安置的典范 Aysegül Balta Özgen, 美国	58

「欢迎莅临在巴西的第四期ISA论坛, 我们期许你努力争取自由、民主与社会正义。若无自由, 将无社会学的可能。」

Jacob Carlos Lima

> 葡萄牙 革命的遗绪

—— Raquel Varela 访谈



Raquel Varela.
来源: Veríssimo Dias.

Raquel Varela 是一位葡萄牙里斯本诺瓦大学(NOVA University of Lisbon in Portugal)的历史学家。她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劳动史、社会福利、二十世纪葡萄牙与欧洲历史,以及社会运动史。她同时也是全球劳工研究联盟(Network for Global Labor Studies)的共同串办人,以及跨国罢工与社会冲突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Strikes and Social Conflicts)的会长。

她在《葡萄牙革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Revolution, 2018)这本着作中,讲述了葡萄牙在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为此,她呈现反殖民运动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葡萄牙的工人、女性与艺术家如何参与其中。

以下是由德国杰纳弗里德希席勒大学(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的 DFG后增长社会研究小组行政主任、《全球对话》助理编辑 Christine Schickert 与 Raquel Varela 进行的访谈内容。

CS: 四十六年前,也就是1974年的四月,葡萄牙的独裁政府遭到一场军事政变终结。政变发生的如此快速,是因为军人们对于葡萄牙政府在其殖民地发动的战争感到不满。你可以和我们聊聊,在战争当时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情况吗?是什

么使得军方对于政府的领导感到失望?

RV: 葡萄牙在当时是一个极度落后的国家。旧帝国和衰落的帝国为了在一场耗时十三年的惨烈战争中对反殖民革命势力,在1961至1974年

>>

间动员了超过百万年轻男性，战火的后果就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殖民战争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解放运动，特别是在几内亚比索由一位被遗忘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 Amílcar Cabral 所主导的运动。

激烈的解放运动以及长期的抗战让一些军人——主要是中阶军官，而不是将军或士兵——意识到战争不应该继续下去，而只有透过政治手段才能结束这场战事。他们于是在1974年四月二十五日组织了一场政变，政变的指挥官是 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他们击败了当时的政权，并罢免了独裁者 Marcello Caetano，但他们叫人民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不过人民没有听从他们的命令，反而走上了街头。

让殖民地的革命显得额外有趣的是，这是第一次第三世界国家说要发生的，最后真的发生了：动乱从殖民地蔓延到市中心、蔓延到大都市，1975年之后又回到殖民地。独裁政府的解放从最初的一场血腥战争，转变为里斯本的街头派对。这场欧洲在战后以来最激进的革命历时十九个月。这场比起1968年三月还要激进的革命，是欧洲战后时代的最后一场革命，也是最后一次对于私有财产制抱持质疑态度的革命。

CS：我想先聚焦在当时军方叫人民待在家里，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的这件事情上。可以请您和我们再多谈一些细节，还有当时人民的处境吗？他们为什么会在这次革命中站在军方那边？

RV：葡萄牙当时已经经历了长达四十八年的独裁统治，而且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1961到1974年间三方之间的殖民战争动员了超过百万人。就比例上来看，这场战争中伤亡的葡萄牙人比在越战中丧生的美国兵还要多。而为了逃离战火和贫困的环境，很多人选择移民，特别是移民到欧洲的其他国家。从1960年开始，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离开。当时的葡萄牙还是世界上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女人的信件甚至会被她们的丈夫拆开来看。

葡萄牙当时是个有九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然而在1974年五月一日，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日的一个星期后，有两百万人站出来庆祝五月的第一个日子，除了要求像是废除独裁体制等民主变革之外，也提出了革命性的社会需求，例如最低

工资、周休二日、夜班加薪、男女薪资平等。在葡萄牙革命期间，有三百万人参与了工会、邻里组织、市议会或学生会的活动。这场革命不只发生在对革命过程而言最重要的工业领域，各种产业的人都加入了，例如服务业。所以当时的医院被医生佔领、学校被老师佔领。由于康乃馨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晚期，葡萄牙的服务业已发展一定程度，有大量的服务业劳工，而这些人都是革命的一员。

CS：接下来我想针对您提到的另一点提问：您说葡萄牙的这场革命是最后一个触碰到财产议题的.....

RV：有六百个公司被佔领，变成自我管理或某种形式的合作社，由工人控制空司的模式被引入更大的公司，而银行被国有化、征收，并且没有给予银行业任何补偿。资产阶级其实在资产被征收的几个月后就逃到巴西去了。虽然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只是个反事实分析（在历史学中我们不会用「如果」这个词——我说这句话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但在我看来，上述事件导致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推行被延后了十年。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型态直到革命之后才被引介至葡萄牙，原因在于那时候美国总统 Gerald Ford 及其政府团队担心葡萄牙可能会成为红色地中海的开端。所以说，葡萄牙革命显示了，就如马克思所言，对工人阶级而言，经济危机并不必然是一场灾难，反而能被他们转变为一场国家的政治危机，来反抗主要的统治阶级。

CS：说到人民，你将你的著作命名为《葡萄牙革命人民史》。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想用这样的方式描述书的内容？

RV：这之中的原因当然包含了「底层历史」以及英国在1960年代的社会史，更直接地说，是受到一位美国的历史学家与思想家 Howard Zinn 的影响。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想法，认为我们必须为那些投身于抗争的、付出血泪的人民，为关于反抗的历史写一份编年史。我们必须将不只是立法机关和政府的历史纳入，还要把人民的历史、同样参与历史过程的无名的多数、工人反抗等等，这些底层的历史也写下来。这些事物都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对于完整地理解历史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工人阶级对于自己能做到什么

>>

事情通常不太有概念，工人阶级曾经发起了什么行动、在某些时刻如何强大、如何改变了世界，甚至改变自己，呈现历史中这些特殊的时刻、将关于人民及其行动的历史写下来便显得更加重要。我们现在在谈论的是一个，在1974年前有四十八年都是欧洲国家中最落后的、却在那之后的二十五年间跃升为拥有全球第十二名的国家健康福利的国家。这样的现象只有通过巨大的集体力量才可能实现。

关于葡萄牙革命同样很有趣的一点是，这是史达林主义的做法首次受到左派的质疑。在1968年五月的运动就已经出现对史达林主义者在法国大工厂霸权的质疑，然而在葡萄牙革命中，这样的质疑更加强烈。那些所谓的极左派，或说共产党中的左派，在领导工会以及联合工会、不管是工业或服务业部门的抗争中，都握有很大的权力。

CS: 让我们谈谈葡萄牙革命的后续吧：不管是在政党层面还是运动层面也好，这些重组的企业以及对于财产归属的质疑、挑战，是否仍然能反映在现今的政治局势上？这与2008年后葡萄牙处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带来的影响的方式有没有关系呢？

RV: 财产关系最后的转变，其中之一是一直持续

到后troika时代对于住房价格的控制。在葡萄牙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德国／欧盟在谈判葡萄牙经济调整方案时提出的要求之一，便是要将居住市场自由化，而这对于贫穷和中产的劳工阶级都有着剧烈的负面影响。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影响中，持续最久的是至今依然持续着的，对于极右势力的反抗。

CS: 是的，这确实是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观点：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葡萄牙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右翼政党。您可以解释这和葡萄牙革命有怎样的关联吗？

RV: 这的确是革命造成的结果之一。这场革命并不只是朝向民主的进程，而是一场清理国家机器，并将右翼政权的领导从中消除的革命；葡萄牙与右翼明确的决裂。如今葡萄牙已经没有极右派的文化与行事作风。这样的情况当然可能会改变，然而至少当经历革命的世代还活在世上，我不认为葡萄牙会有出现极右派的可能。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并不能确定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来信寄至 Raquel Varela
<raquel_cardeira_varela@yahoo.co.uk>

> 21世纪的 四大交互挑战

Geoffrey Pleyers,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比利时, 第四届ISA社会学论坛会长及ISA研究副会长 (2018-22), ISA宗教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前会长 (RC47), ISA宗教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委员 (RC22), 青年社会学 (RC34), 社会运动, 集体行动与社会变迁 (RC48)



在 2001年一月,来自各大洲的两万名运动者及知识份子聚集在阿雷格里港,参加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他们集结于此,是期望着二十一世纪将比起以往更民主、国际之间的团结与全球各地的抗争能够将全球化的进程推向更平等与更公平的方向。

在将近二十年之后的2020年七月,五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家将会来到同一个城市并加入 ISA Forum of Sociology,以分析社会变迁、分享他们对于本世纪四大挑战的研究与观点,以及社会科学如何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然而这一次集结的社会背景与氛围将会与前一次相当不同,千禧年的乐观态度已经消退、人类共同生活于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而面临的困难也比过去更加紧迫。

民主、环境危机、不平等、交织性,这四大挑战在近二十年来,尤其是近五年来,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千禧年之际,民主的深化与扩展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黑人运动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被评析为「第四波民主浪潮」。然而,即便2010年代开始于各地民主运动的展开,却结束于反自由领导者的出现,威胁着民主、环境、包容、两性平等的价值。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更加民主的全球化治理能够处理气候变迁、移民、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等等议题所抱持的期望,也逐渐破灭。如今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面对这些挑战,民主必须在代议制度之外创造新的模式。

>>

这十年之间，超级富豪与其他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已开发」国家的贫穷指数不断增长，无论是那些如美国和德国等经历了至今以来最长经济成长时期的国家，或是那些经济及社会福利状况受到紧缩计划重创的国家。在这十年的后半段，环境灾害、性别暴力与种族主义这两个议题再次受到重大关注。身处全球南方的妇女站到了捍卫民主、谴责父权主义的前线，如三月八号罢工、#NiUnaMenos和#MeToo运动等等女性主义的动员活动，也使得性骚扰和谋杀女性成为新闻头条、日常生活以及大学校园中的焦点。青少年的罢课活动也让气候变迁与环境灾害受到全球的关注。受到全球南方运动深刻的影响，他们进而推展更为整体性的生态愿景，并诉求必要的系统性变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最新一期的报告中就指出，除了生物大规模地灭绝，二十一世纪气候变化的数据也令人担忧。

> 交互的挑战

社会运动以及社会科学在这个世纪的前二十年教会我们的，是这四大挑战是难以分开来讨论的。民主、环境危机、不平等、交织性之间逐渐增长的连结，迫使我们必须以四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出发点，重新审视并理解这些概念。

举例而言，考虑到环境危机、不平等和交织性可以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民主。一方面，越来越多国家的民主受到反自由主义领导者的威胁，他们拆解了人权、多元性、对公民的平等尊重等等基本价值，并且助长了父权体制、种族歧视、不平等，以及跨国企业加剧环境破坏的行为。另一方面，进步运动也挑战了制度性民主，他们认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民主体制不够完备，对此诉求政治、文化与社会上的改变与实际的行为：例如针对全球暖化与环境破坏提出具全球规模的应对方式；在当前父权文化下的亲密关系与日常生活，提出对于性暴力和女性谋杀的解决手段。

不平等现象的崛起对于民主及环境而言都是个相当大的威胁。全球性不平等的现象已经严重到，那些前百分之一富有的人和跨国公司在国家与国际之间都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力。与

Michael Walzer 提出的「领域分离(separation of the spheres)」的民主理想相去甚远的是，过去十年，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亿万富翁当选总统的现象，政治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勾结以及倡议团体的主导权已成为许多当代政治政权的核心特征。

气候正义运动与社会学家都指出，气候变迁和大自然的破坏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社会问题，若不对社会进行重大的变革，这些问题便无法受到减缓。其原因在于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对于自然资源越滚越大的贪婪。虽然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对于环境灾害要负的责任却有很大的差异。乐施会计算出的人最富有的1%的人均生态足迹是最贫穷的10%的175倍。此交互取向和环境正义运动向我们显示，即便妇女、少数民族和较不富裕的人导致的地球破坏较少，他们却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例如预期寿命的降低和气候难民的出现。

如何克服长久以来的、相互交织的经济、种族、殖民、性别歧视以及使其延续的暴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重大挑战。黑人女性运动者、原住民运动以及社会科学家揭示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交互性，这样的特性造成了重叠且相互依存的歧视与弱势体制。交织的观点导致了对于民主挑战、不平等以及环境正义的重新审视。现况下的代议制度在处理种族主义和父权体制的压迫方面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不平等与性别和种族主义的歧视是密切相关的，环境灾害与全球暖化造成的伤害之间的关系也同是如此。对于交织性的意识不断提升，既触发了次要行动者与社会运动的兴起，同时也是其产出的结果。原住民族群、少数民族、女性主义者、小农透过实践、社会抗争以及另类的世界观来抵制不公正。

对于关注社会政策以及经济成长的、较激进的运动者而言，性别时常被认为是一个次要的议题。然而此议题在今日为了寻求全球民主而进行的战役中却有着核心的地位。在2020年，有色以及少数民族背景的女性是反自由和专制政权下的第一批受害者。她们同时也站在21世纪捍卫、重构民主的前线。她们为一个理想的世界铺平了道路，在这个世界里，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情心、团结和对自己、他人及自然的关怀将重塑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对于共同生活于资源有限的星球上的理解。

>>

然而，将所有受压迫的行动者都与生态的复兴联系起来，其实是一种误导。虽然女性主义者与原住民运动处在生态抗争的前线，Arlie Hochschild 针对路易斯安那州的环境灾害受害者进行的研究，则显示这些受害者如何成为反动以及种族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的基础，并直接对我们的民主体制与环境造成威胁。这提醒了我们，面对这些环境挑战的方式，与我们的民主未来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

将这四个挑战联系起来后可以发现，它们深植于权力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现代文化、主观性、世界观和社会科学中。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四者是无法被当作不同的挑战、分别的需要、或独立的研究领域来处理的，我们不可能在解决其中一个的同时不去面对另外三个。它们共同构成了拉丁美洲学者所说「文明危机」的整体。

> 2020年ISA论坛： 共享研究分析的机会

2020年的ISA论坛使我们得以分享对于这四大挑战以及他们之间关联的分析，并讨论因这四大挑战而出现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与应对这些挑战的行动者的关系，以及社会学面对这些挑战的贡献。我们的学科如何因这些挑战与从中涌现的行动者而转变？将行动者作为知识生产者考量进来，将如何影响我们采用新的认识论？创新社会分析如何对于我们在全球化纪元理解、解决共同的挑战做出贡献？我们主要需要克服的难关为何？民主、生态、不平等、交织性等概念如何因近年的经验、行动者与挑战而重新受到重视？他们如何成为21世纪的进步与反动战场前线的主要角色？

进入这世纪二十年以来，硬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显示，我们正处在应对大多数挑战的十字路口。人类在下一个十年间面对这些挑战的方式，将会影响人们在接下来的整个21世纪中的生活。■

来信请寄至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 当 SBS 迎來 ISA 论坛

Jacob Carlos Lima, Federal University of São Carlos, 巴西, 巴西社会学学会主席, ISA工作社会学(RC30)研究委员会委员



2017年是巴西社会学协会(SBS)创建的第七周年。此协会创立于1937年,当时命名为保利斯塔(Paulista)社会学协会。实际上是到1950年才正式组成了巴西社会学协会,并加入了当时新创立的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由于SBS其特定专业领域下的政治与组织性特点与大学的专业几乎完全重叠,协会在1937至2017之间并不是持续运作。在1950年重新组织后,SBS于1954年在圣保罗召开了首次的巴西社会学会议。此后,1964年时的军队政变使社会学界受到了重创,也牵连使许多社会学教授与学者进行强制退休。直到1985年的民主化过后协会才重建完成。从此之后,协会每半年举行一次议程,照常运作。2019年第19次会议举行在弗洛里亚诺波利斯(Florianópolis)。

SBS在最初的十几年伴随着社会学、政治、社会科学等科目在大学课程中的建立,最早是在1933年的圣保罗市开始。到1964年时,已有19个相关课程被不同地区的大学采用。此外,也有两个研究所课程被圣保罗市地区的大学采用。

在这段期间内,不论是社会学的研究作品数量,或是对于社会学使否能作为一种科学的质疑都在增加中,但研究上的主题仍侷限在圣

保罗市中。而在此时,军队的独裁对于科学与科技自治的重视,偶然地促使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扩张;研究的制度化与研究生的产生机制,导致了大学与研究生教育在国内的增加,促使了1970年代社会科学协会的成立与相关会议的举行还有科学知识的传播。由CAPES(支持与评估大学教育的巴西邦联机构)针对大学生计划的评估机构指出,博士程度的学位是任职公立大学、获得研究基金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而这也立定了国家学术研究的品质基础。

在民主化后,这种学术的扩张受到鼓励学术发展的政策更加地提升,巩固社会学成为一种学术训练及研究领域。同时,在国际化的趋势下也使得巴西的社会学界在国际上亮相。在2006年,这种训练成为高中的必修科目,扩展了市场中社会学家的人才需求。必须强调的是,这种需求只出现在高中以上的教育体制中;相反地,在其他类别的工作中几乎是没有这种需求,因为大部分的社会学家不是被公部门聘用为社会计划的科技人员,就是于NGOs或私人企业这些同样是人文系所毕业的大学生工作的地方工作。

然而,这些协会所达到的里程碑,却受到2016年时俗称「国会政变」的事件威胁。社会学这个学科受到统治者们针对效益与实用性上的质疑。不论是大学或是高中,研究经费等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干涉。近期,社会学被指控正在宣传

>>



日落时的阿雷格里港。Felipe Valduga摄。保留部分权利。

一种会威胁到巴西家庭关系的模糊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

在这些令人担忧的现况下，这些指控还在持续增加中，而社会学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指控的目标。2017年，在一次仓促的高中课程更动中，社会学跟哲学一同被降级为选修科目。极右派政府接着在2019年将矛头指向这两门学科，认为公立大学应该以「实用性」为优先出发点去开课，例如兽医相关的课程；而那些想去专研社会学、哲学的学生应该去就读私立大学。针对社会学及哲学的大学、研究所课程集中的公立大学，相关的指控开始蔓延并普遍人心。指控者不是认为上这些课程是在浪费钱，就是认为这些大学是政治反对抵抗力量的所在地。

SBS还有其他巴西的社会科学界，像是巴西人类学协会(ABA)、巴西政治学协会(ABCP)、巴西科学学会(SBPC)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抵抗政

府以财务调整为由而行使公权力施加的干涉政策。自1990年代以来，类似的政策在许多国家导致了社会与政治上的噩耗，像是2000年的阿根廷或是2010年的希腊等。

在这个脉络下，在巴西举办的IV ISA论坛展现了一个我们对这些攻击做出抵抗的额外场域，这不仅是为了社会学知识的存续，也是为了与粗鄙、未开化的心智(barbarism)而战。这种未开化的心智不只是伴随着带有崎岖思想的宗教基本教义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还有与共和体制共谋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ism)，这些本应当守护民主的价值，但显然地这些思想对于民主没有多大的信心。

我们欢迎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在这场为自由、民主、社会正义奋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因为没有自由的话，就不会有社会学的出现。■

来信请寄至 Jacob Carlos Lima
<jacobl@uol.com.br>

> 简评： 巴西社会学界

Hermílio Santos,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PUCRS), 巴西, 第四期ISA社会学论坛的地方委员会主席, 传记与社会 (RC38), **André Salata**, PUCRS, 巴西, 第四期ISA社会学论坛的地方委员会副主席, **Emil Sobottka**, PUCRS, 巴西, 第四期ISA社会学论坛的地方委员会计划协调员。



南里奥格兰德天主教大学(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是第四次社会学论坛的举办地。Marcelo Träsel/Flickr 摄。
保留部分权利。

巴西社会学界当前的状况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高度的制度化、多产且多样化。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毫不含糊的尝试让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与关联去合理化。正是在这个敏感的背景下，巴西将首次主办国际社会学协会 (ISA) 的一项重大活动：第四届ISA社会学论坛，此活动将于2020年7月14日至18日在阿雷格里港的南大河天主教大学 (PUCRS) 举行。巴西人对ISA的支持并不陌生，与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不断增长一样，而且，这正与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 (Fernando >>

Henrique Cardoso)主席的声明雷同(其为ISA自1948年成立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的拉丁美洲主席)。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社会学家的加入使得这场论坛更富有意义。

巴西社会学界最初是借由不同的专业领域来建构出民族认同问题而彰显出来。种族问题因当地人口组成的多元性而受到特别的处理:欧洲白人、被奴役的非洲黑人与原住民。即使种族与现代化问题仍然是社会学家间经常讨论的议题,在过去数十年来,古典作家的影响与对实证研究的日益支持有助于多样化与民族社会学的发展。在军事政权的统治下(1964年至1985年),年轻世代的社会学教授被迫流亡,但出乎意料的是,几个社会学研究学程被建立起来,而科学期刊也被构思且公开发行。

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一直都是大多数巴西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举例来说,巴西社会科学的奠基者之一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提出一个问题,即巴西自成立以来,社会秩序如何在巴西社会强烈的对抗中取得平衡。同样的,弗洛斯坦·费南德兹(Florestan Fernandes)的贡献是无法计算的,他(与他当时的学生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等一群社会学家)对不平等与分层的古老形式如何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倖存下来进行很扎实且大量的研究。对这几个问题有高度重视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不平等现象的严重程度与持续性被视为巴西史上长久的主要特征。

1984年后的民主化时期促成要求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利的社会运动激增,民主与社会正义紧密相连。这些主题常被作为研究参与者的社会学家所吸收与理解,因此,丝毫不惊讶的是,巴西的现实需要仔细的进行社会学分析,其超越对不平等的良性叙述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时间

的主要学识特征。正如2013年的抗议活动主要是针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且随后发生的政治抗争表明,巴西社会并不是像曾经形容的那样,这让社会学家们理解不断变化的现实造成挑战。

巴西的社会实体也需要多面向且交叉的角度来检视,但这需要更加复杂的分析工具。例如,在巴西的劳动市场上,黑人的收入仍比白人少约40%,而经验研究也表明,收入会随性别、地区或阶级而有所变化。若考量不同的分层原则是如何互动,巴西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其能够用来分析现代社会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这种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可能与巴西社会学界最近对环境议题的兴趣有关。

在当今我们实践的全球社会学中,作为更广泛实体的一部份,巴西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必须在全球性的集体项目中进行研究。与上述相似的问题近来在许多国家也获得重视,最近的政治活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社会现今正更加关注民主化、人民参与与不平等的问题。我们毫不怀疑巴西社会学界能够为这场论战做出巨大的贡献,而我们的现实为分析这些经验问题提供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框架。

目前从国内不同地区的年轻研究员中选出的六篇文章是社会学界正从事丰富国家科学生产成果的范本。尽管不是详尽的典藏,但这表明优良作品的质量,以及主题、理论与方法论取境的多样性。这些以及许多社会科学家将参与巴西社会学学会(SBS)与PUCRS合作举办的ISA论坛期间的讨论。■

来信请至

Hermílio Santos <hermilio@pucrs.br>

André Salata <andre.salata@pucrs.br>

Emil Sobottka <esobottka@pucrs.br>

> 制度化童年的叙事

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巴西, ISA传记与社会(RC38) 委员会委员。



收容未成年者的农业机构，巴塔泰斯，圣保罗州，巴西。
来源：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在军队独裁时期(1964-1985)，巴西人民不只经历了政治迫害、恶意拘禁、拷打折磨、审查制度、人口失踪，还目睹了高压统治下处于社会边缘、流离失所的孩童遭受他人利用。针对这一点，政府创立了国家青少年福利基金会(FUNABEM)，以负责当时的所有婴儿、孩童的安全。FUNABEM整合了当时的所有规训组织，并强化了对穷困孩童与青少年的收容。对这些孩童、青少年而言，曾在全控机构中与外界隔绝的童年时期，会使其在成年后因先前的收容经验而留下污名的标记。在十几年过后，一部分当时受到拘禁的青少年、孩童，透过了社群媒体、年度聚会重聚，形成了一种人际网路。而这都是为了不要让自己忘记当年那一段记忆：乡村生活、制度下的压迫、对未来的不安感、童工、男性的社会化历程、以及规训。

我们采用了「记忆」的社会学理论形成研究框架，去了解研究对象过去收容时期由规训机构所建构的记忆实作的过程动态，以此去处理研究对象的成长时光以及身份面向。在四年之中，我们已经收集了许多关于他们多面向互动过程的资料，透过交织在一起的意识、社会关系、技术物(artifacts)等相关的面相去调查他们形成记忆的过程。资料收集的方法从深度访谈到传统民族志(traditional ethnography)、网路民族志(netnography)等。我们使用诠释学(hermeneutic work)的方式，在时间序列上去做程序处理，诠释他们是如何去理解过去的经验，以此去处理他们的叙述内容。

我们发现时间序列以及他们互动中的改变，是他们如何去定义自己的身份、理解自己过去的决定因素。他们的叙述时常被理解成是掩饰真正



過去的收容者再次拜訪收容機構。
來源：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事件的一种诠释方式。这些叙述通常隐藏了他们过去艰辛的事件，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意义被捏造出来，融入这些事件中形成一种被人生目标启发的故事情节。而除了他们的叙述之外，三种负面的情节被他们诠释成正面的形象：父母的弃养被形塑成一种利他行为(altruism)；制度性的暴力被认为具有合法性；在监护设施中被当成童工剥削被当成是一种提拔他们成长的经验。

存在于同一个集体记忆的群体会创造出一种「验证网路」(network of validations)。在这个意义上，某一些特定的诠释方式比起其他方式更加普遍。在社群网路中，构成他们过去的意义与诠释方式会多少趋于一致，因为当局外人的说词不被网路里的其他人认可，这些说词与诠释便会日益消失在社群思想中。虽然自传式的叙

述仰赖的是个人记忆，但当我们试图以一般的角度去理解研究对象，会促使这些先前受收容的对象将他们对过去的叙事调整为具有整体性、正面性的，一个完整的生命故事。生命故事中遇到的许多艰辛困难(弃养、机构暴力、被隔离的童年记忆、被污名化的人生，这只是其中几点)被认为是迎向成功的垫脚石。机构刻印在他们心中的那些价值观被独裁政权的单位所褒扬宣传，特别是那些透过规训成长的孩童，时常不带批判地遵循规则。在这个验证网路之中，建立一套标准论述的方式使他们对于过去的经历产生一种归属感，而其他有相同经验的人也会对此感同身受。■

来信请至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veridiana@uchicago.edu>

> 社会救助作为政策部门： 巴西的案例

Gustavo Conde Margarites, Federal Institute of Rio Grande do Sul, 巴西



1988年，制宪会议的成员们庆祝巴西联邦政府宪法的颁布。
来源：Agência Brasil/Archive.

在巴西，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建立以来，社会救助的制度始终不受重视，政府所挹注的资源并不稳定。针对此议题的提案也总是基于公益与慈善的理由。社会救助的相关业务更往往被视为一种社会安全保障的措施，使得主管这两项业务的部门彼此间的界线日渐模糊。本文奠基于笔者的博士论文研究，将会分析在社会权的概念下，社会救助机制进入行政体系的制度变革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巴西联邦宪法中的入法（1986-1988），以及「社会救助组织法」的立法（1991-1993）。在这两个阶段里，各方人马均针对相关议题向政府提出建言，促成了新部门的成立。

在第一阶段的立法进程中，组织改革的主力来自于关注国家社会安全网重组议题的社群，透过参与联邦政府事务体系所召集的专家团体，他们得以影响政府的运作。这些倡议者将社会防护的机制视为一种国家应保障全体公民均能享有的权利，并期望能建立一个与此理念相符的体制。对他们而言，社会救助将能在他们提出的政策方案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相关制度能确保那些被遗漏在社会安全网之外的公民，也能为其他形式的社会防护机制所保障。

第二阶段立法的特点则是社会工作领域的

专业从业人员及学者的加入。在修订后的联邦宪法公布生效之前，这些专业人士并没有参与研讨的过程。但在这波修法的讨论中，来自学术界及社会工作实务界的行动者却逐渐集结起来。这被解读为法规上的转型对相关部门看待他们自身与国家体制关系的连带影响。长期以来，诸如「国家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资产阶级进行再生产的工具」，结构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地弥漫着。这种理解国家运作方式的理论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式微，于此同时，将国家视为反霸权斗争场域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思想兴起。此一转向也使得从事公共政策及社会工作相关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与研究者一改先前观望的态度。做为这个理论架构转型的结果，学术界跟社会工作业界人士共组一个倡议团体，进一步促使社会救助跟社会安全区分成不同的行政部门。

本研究的结果指出，只有外于既有社会政策、不随之变动的因素，如军事独裁政权的终结、全新民主政体的成形及相关领域（社会工作、社会安全）团体的积极运作等几项条件俱足的情况下，社会救助体系才得以进入巴西政府体制的当中。■

来信请至 Gustavo Conde Margarites
<gustavo.margarites@gmail.com>

> 愉港女性的 都市居住抗争

Priscila Susin,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巴西



Priscila Susin 在阿雷格里港市中心俯瞰主要由女性管理的蹲點建築屋頂，2019。
來源：Priscila Susin.

在 巴西的主要城市中，住房供給不足的情況波及了許多貧窮人口，尤其黑人女性更是受其影響。自1980年代以來，如棚戶區運動的住房社會運動於都市地區興起，引發了新的政治劇碼；佔用市中心廢棄建築的現象中，人們注意到城市中有大量已經毫無社會功能的房產。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居住於這種空間的是女性，這顯示她們不管在制度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遭受了多種層面的隔離。我在博士研究中和這些女性建立暫時性的紮實對話，試圖理解他們在參與政治倡議團體以及搬進棚戶區之前與之後，對於居住抗爭行動的詮釋與經驗。

> 詮釋性與傳記取徑

田野調查是在2015至2018年、於南里約格蘭德周的首都愉港執行。為了蒐集歷時與共時的傳記資料，我針對居住於兩座市中心棚戶區建築中的多位女性進行參與式觀察與傳記式訪談。在經驗資料的蒐集上，我幾乎每周參與社會運動的行程，以確保能對政治與日常事務有持續的了解。

此研究所應用的方法在認識論上以 Alfred Schütz 的社會學以及一套借鑑於Berger與Luckmann的完整概念為支持基礎；前者又以「

>>



在阿雷格里港市中心的蹲點建築牆上，寫著「城市中心屬於人民」的塗鴉，2018。
來源：Priscila Susin.

相关系统(relevance system)」为主，后者则是关于如何能够触及现实中的世俗社会结构典型。由Gabriele Rosenthal 所提出的传记取向研究方法，也协助重建这23位受访女性身处于社会、历史框架中的传记经验。

> 在「传统化」与「政治化」的符号领域之间

主要的研究发现揭示了住房和性别议题的交织性，为解决这类研究在方法上的侷限提供了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观点。透过重建受访者的相关系统，我们得以凸显束缚、反抗与应对，这些从预想的分析范畴中通常不会被考量的因素。

借由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阶层文化，可以发现社会运动组织的本质抹煞了女性在经历「抗争」时平等地参与政治的机会。然而如同进行田野时所观察到的，新政治活动的不断发展与近年来性别相关的传统监督原则的冲突与变化有着根本上的关联。

在传记分析中，「传统化」与「政治化」之间潜在解释的重叠于符号领域中一再地出现。为了赋予游走于城市违法边缘正当性，受访者表示其在面对社会所期待的性别角色如负责生育与家务劳动，以及实践新兴的政治理念如取得适当的住宅与进入都市的权利时经常会面临的矛盾。即便前者很大程度地与外部的、被写进法条中的阶级价值观相关，后者则是与抗争的内部政治相关、并可能导致居住抗争被概括为一种「手段」和「目的」；这两种类型的自我展演都是为了累积更多的道德资本。■

来信请至 Priscila Susin
<pri.qsusin@gmail.com>

> 巴西勒西菲市 针对暴力行为的 非正式治理

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Federal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 勒西菲, 巴西, 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会员 (ALAS)



20

勒西菲·巴西·2019°來源：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

在中南美洲不具行政自治权的地区，正式及非正式的暴力管制措施，以及在地治理等议题，早已是社会学研究多年来的研究题目。笔者希望能够透过本研究（同时也是笔者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理解在没有州政府层级政府机关介入的情况下，巴西勒西菲市(Recife)南部社区的暴力行为是如何被控管的。就实务层面来说，州政府层级外的暴力管制规范意味着当地的行动者之间存在协议以及对彼此的授权，使得在体制之外仍旧能够在互信的基础上有所应对。

而本研究即提出一项假说，认为巴西当局警察机关的执法效能与缺乏刑罚的正当性与法源依据，造就了当地在暴力治理的议题上出现州政府体制外非正式治理的现象。其他与社区暴力的管控动辄有所关联的重要变因，也包含了毒品市场的动态以及由在地行动者建构的非正式治理网路，前者的破碎化在阻绝了监管者权力的集中化，后者的存在也对当地的谋杀率造成影响。本研究以民族志的方式蒐集调查资料，即笔者在勒西菲市一个低收入社区中生活五个月，除采行非参与观察研究外，也在过程中进行数十次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半解构式访谈。

目前的研究的进程指出，宪兵在该社区中的运作与部署将是后续针对非正式治理的探究工作中极具解释力的一环。在社区里，宪兵几乎可以在无须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无预警地且不成比例地以滥权对居民施行一连串的限制。至于当地的司法机关，在冲突调解的议题中，则在法律上缺乏正当性，无法发挥作用。

在所有发现中，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可能是，社区里针对暴力行为的规范是在当地受景仰者的指使与授权而得以运行。诚如过去对于黑手党(Gambetta, 1993)或是PCC(Primeiro Comando da Capital, 巴西最大的犯罪集团)(Feltran, 2010)的研究，在这样的非正规处置

机制里并不存在稳定的处分与执法者。也如同Bourgois及Venkatesh分别在2003年及2009年的研究发现，在地的帮派组织尚未涉入此一议题。

尽管这些作为对减少犯罪情事往往治标不治本，但它们确实拥有影响力，也显现在当地暴力行为可以被掌控在相较警察执法更具正当性的作为下。而当地的非正式治理形式或多或少投射出一种意图：当矛盾形成时，当地人期待的是化解冲突的机制，而非一个减少纷争发生的制度框架。冲突调解的主事者在执行时常审慎为之、暗中行事，这使得大多数的居民并不清楚这些处分的运作机制。因此，这些处分也就不会成为此类作为的典范，进而跟当地既有的暴力防治需求产生连结。■

参考资料：

- Bourgois, P. (2003)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ltran, G. (2010) "Crime e castigo na cidade: os repertórios da justiça e a questão do homicídio nas periferias de São Paulo." *Caderno CRH* 23(58).
- Gambetta, D. (1993) *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enkatesh, S. (2009) *Gang leader for a day*. London: Penguin UK.

來信請至 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ricardocaldas13@gmail.com>

> 巴西的职业 不平等

Lucas Pereira Wan Der Maas, Federal University of Minas Gerais (UFMG), 巴西



在巴西，追求专业阶层及高学历不再能在劳动市场中取得优势。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及民主化，巴西的职业环境遭逢改变。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拥有大学学历证明的人口数增长了超过一倍，其中包含在过去教育参与程度偏低的族群、女性，以及倾向将自身定义为棕色／黑色人种和低收入的人。

相较于高收入国家在1960年代便出现大学入学人数的增长、有着超过50%的净入学率，相同的现象在巴西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在2000年至2010年之间，18到24岁之间的青年具有大学入学资格的比例从28.4%提升至48.5%。纵然如此，实际上真的进入高等教育范围的比率仅从9.1%增至18.7%；净入学率则从7.4%增至14%

>>

，其相较于智利或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2010年超过30%的净入学率，在数值上而言仍是较低的。

除此之外，刚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在进入劳动市场时并无法符合相应需求。学历证明如今陷入了通货膨胀的处境，例如工作中更高的教育程度门槛、专业人士进入劳动市场后无法被有效利用、专业职务的竞争加剧，以及学历证明的经济价值萎缩。学历的通膨不只涉及到供需的不平衡，也与在社会上透过学历证明取得优势的能力下降有关，学历证明也被贬值为一种社会分配机制。

我的博士学位研究主要的目标，是理解专业团体之社会基础的扩展、以及学历证明的贬值，如何影响了立足于专业主义之上的社会分层，特别是与中产阶级相关职位的保存与取得。我的研究会聚焦于卫生领域中两个专业——药品与护理——的轨迹，对1991至2010年间、专业内和专业之间的不平等进行实证分析。

本研究参考了公家机关公布的人口统计、高等教育相关统计，以及劳动市场资料，并收集了来自线上调查的样本，共计217位医师及222位护理师。同时借由关联和群集分析来建立轨迹，试图从经验性的角度，组织职场在不同个体经验中的变数，从家境出身、专业训练到工作取得。此分析使得从研究对象的职位、部门和工作更动来解释职场得以可能。

研究中有四项较重大的发现：(1)学位证书与毕业生数量由于高等教育名额中的空缺增加，

在1991至2010年间有显著的增长。(2)工作招募的社会基础扩展至女性、低收入学生、自身认同为黑色或棕色人种的人等对象。(3)在职业市场中的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学历贬值。(4)在学大学生的人口数增加，女性、黑色与棕色人种、青年和声望较低的专业人士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轨迹可以发现，家族的继承和高等教育的途径在取得职场中的重要职位时有显著的重要性。毕业的时期与专业人士的年纪也会影响专业间与专业内的分工。性别隔离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女性在较低资本的轨迹中参与程度也较高。专业内和专业外的分工都会再制并强化职场中的不平等。这样的分工也体现在受访者的阶级观念上。

简而言之，在1991至2010年间的巴西，专业主义的开放重新定义了职场，使其变得资本较低，且较不平等。即便社会提升的运动逐渐扩展，从专业间、专业内分工的角度而言，职场的内部结构仍未改变，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位再生产的机制得以持续存在。■

来信请至 Lucas Pereira Wan Der Maas
<lucaswander@hotmail.com>

> 里约热内卢 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

Izabelle Vieira, PPCIS/UERJ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

| Arbu绘。



在2000年代时巴西经历了经济成长，使人们感受到了收入与消费水准的提高。然而，在2014年国内爆发的政经危机中，只让人们感受到失业率的上升以及货币的贬值。

为了了解社会流动的过程，以及近期爆发的政经危机对中产阶级生命历程的影响，我们采用质性研究并使用参与观察法与深入访谈法，对里约热内卢的佩欣莎(Pechincha)地区大厦中的28位受访者进行研究。

研究中的参与者皆自认为属于社会阶层的中间区块，与「中产阶级」或其他相关词汇相呼应。

参与者能够叙述出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高潮迭起，如同受访者Igor(42岁，司机)所言：「你看看，我曾经上过中学。……我不会说那有多厉害，但已经算很不错了，如今我却处于人生的低谷。」一般大众的想法都认为景气繁荣的时期都是一段空想，因为过去并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基础。

在近期团体研究中指出，消费的规模是驱动社会分化的关键。如今人们面对经济危机必须减少消费模式，也因此商品时常立足于令人无法满足的象征边界上：「消费性商品给了人一种已经成熟的不恰当印象」(Arthur, 46, 空军)；「我觉

得中产阶级受广告影响很深。广告鼓励人们旅行，但一旦你去旅行，你又会发现实际上的旅游体验不像广告说的那样(笑)。」(Gilmar, 64, 销售员)。

从受访者的叙述中可得知，在他们的家庭中他们受到父母很大的期望，这些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小孩能够比他们得到更多的教育。这些父母为了他们的小孩做了真正的「牺牲」，只为了让小孩去读私立的小学跟中学。而价值观的传递与实践是他们拒绝公立学校最主要的原因：「……让小孩与其他同龄孩童一起共处于这种非凡的教育是重要的，对吧？这是我们对小孩付出最大的关心。」(Ilza, 47, 待业中，前保安)。

此外，受访者们对于如何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感到非常地不安。在这个意义上，私立学校同时拥有象征与阶级归属的工具两种属性：「情况很可能是我的小孩需要去读公立学校，而我却已将自己看作与他不同的阶级。这样真的很奇怪！」(Lara, 42, 待业中，前保安)。

中产阶级并没有累积财富，他们只拥有知识与工作技能。这些「资本」将在每一个世代中更新，在新的世代中，可能就需要付出某些努力与承诺才能重新获得。因此，无法在当前的政经危机中抓住一线生机的中产阶级，只好将社会地位提升的希望赌注在他们的孩子身上。■

来信请至 Izabelle Vieira
<representar.mg@hotmail.com>

> 经济紧缩：

医疗照护的普世性原则会被妥协吗？

Maria Petmesidou, 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希腊, Ana Guillén, University of Oviedo, 西班牙, Emmanuele Pavolini, University of Macerata, 义大利

当提供共同医疗服务的范畴或是获得医疗服务的条件有任何变化，普遍性原则的轮廓与社会基本的团结将会大幅改变。义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与希腊自从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早期就拥有全民医疗照护系统，但是，后面两个国家却因其自身「不完全」的普遍性原则而受人注目，因为不平等的混合型照顾服务一直持续到最近，其将卫生系统中负担不同社会阶级的社会卫生保险与高额的自付费用结合在一起。金融危机对所有四个医疗照护体系造成沉重的打击，其中对希腊的影响最为深远。

金融危机与财政紧缩政策是否使这四个医疗照护体系正朝向普遍性原则的范围与内容而有明显转变？简言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向这个结果。在过去十年中，这四个国家都有实行一系列类似的政策，如提高成本的分担（主要是药品）、条款的改变或是物质与人力资源的减少。然而，这四国的这些措施将大幅度的转移医疗费用给病患，并加剧获得医疗服务的不平等。此外，面临最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并已接受救助计划）的希腊和葡萄牙，在国内外压力错综复杂，且仅有较精简的公众服务的情况下，仍大大的催化出旨在解决系统碎裂化、提高透明度、促进供给均等的改变。

> 公共支出的下降与未符合的需求

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2008—2013），希腊的人均公共卫生支出（为能够进行比较，运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衡量，并以2010年固定的价

格计算）急遽下降约30%。而葡萄牙、义大利、西班牙分别下降12%、8%、3%。随后，希腊与义大利的调降几乎停滞，但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有适度的恢复的趋势。但是，在这四个国家中，与欧盟15国（指欧盟东扩前的15个会员国）平均值的差距持续扩大。2017年，希腊的人均公共卫生支出跌到只剩欧盟15国平均的三分之一，而葡萄牙则跌到剩欧盟的一半。西班牙跟义大利则较接近欧盟的平均值。然而，特别是自从2013年，这四个国家就医的私人费用一直在增加，其占就医总支出的24%（希腊）至40%（西班牙）。

时至今日，希腊因为无法负担医疗支出，而显现出高比例不符需求的医疗照护。在希腊，即使是中产阶级家庭，特别是有小孩跟老人的家庭，也有负担医疗照护支出的经济障碍。因此，医疗费用私人支出的潜在风险对家庭预算维持灾难性的高。在西班牙与义大利，在危急时期接受专科治疗与医疗照护的等待时间构成影响人们对不同医疗水平满意度的主要障碍。然而，未满足需求的比率在西班牙保持最低。但是，这两个国家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有很强烈的地区差异。这在义大利特别明显，南部地区与中北部地区相比，严重缺乏足够的资源。

希腊（某种程度上葡萄牙也是如此）进行医疗改革，使其能够更严格监控医生的医疗行为（例如对诊断/实验室检查后转诊人数进行限制、处方药每月限额等），借此让医疗体系更加透明化，有助于控制成本。但与此同时，改革会影响医疗体系的渗透性与导航性。在这两个国家，初级与专科医院的照护间依然混合着零散的照护途径。此

「在希腊,即使是中等收入家庭,特别是那些有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也面临着医疗保健方面的财政障碍。」

外,在这四个国家中,几种能够避免住院的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等)较为常见,反映出在初期预防的卫生健康提倡效率较低,对公平产生负面影响。

> 值得关注的重点

以下有几个重点。第一,遵守卫生政策来紧缩公共部门资源的作法持续存在。这显现出人均私人医疗保健支出正稳定成长,而公共支出的增长相当缓慢(或停滞)。第二,原则上承保资格维持全面性,但实际上对许多弱势群体来说是一大挑战(因每个国家不同的原因,如负担不起费用、漫长的等待时间与遥远的就医距离等)。第三,私人医疗保险(职业或自愿)正在扩大:2005年至2015年,西班牙的私人保险费用几乎涨一倍,葡萄牙则明显的上升。义大利的危机也正在增加,而希腊的危机则停止初期上升的趋势。但希腊自费的金额一直稳定增长。到目前为止,人们投保私人健康保险是为了能够更快速的获得专科护理,其中主要涵盖大型企业的员工。

未来这种趋势将如何发展以及损害全民负担的可能性大大的取决于几个因素,例如重新制定公私混合的政策、劳工的偏好、税务政策等。如果职业健康保险变成更全面性(复盖多数工人并受到严格监管,正如几个北欧国家的情况),那就能够在接触医疗过程时保持平等。这将能够减轻公共财政的压力,但同时又能够维持普遍性的医疗支出。但是,如果职业保险仅复盖部分劳动人口(特权阶级),即有可能变成特殊职业互惠主义的保险类型,最终将会削弱普遍性原则。

最后,在可预见的未来,公共医疗体系将会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伴随着卫生领域科技快速发展,以及对早期预防服务(由于这四个国家的表现不佳)与因人口高龄化造成社会照顾服务(主要是长期)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可能进一步触发重新组成公共与私人间的连结,并改变医疗保健领域的社会团结。■

来信请至: Maria Petmesidou

<marpetm@otenet.gr>

Ana Guillén

<aguillen@uniovi.es>

Emmanuele Pavolini

<emmanuele.pavolini@unimc.it>

> 新零售工紀元的 失业救济金

Daniel Clegg,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英国



零时契约是英国的劳工抗议时常出现的议题。
Christopher Thomond 摄。

为 身体健康且能够工作的成年人提供替代收入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政策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为保护非自愿离职而导致收入的损失，失业救济长期以来被批评可能会成为对自愿离职的一种补贴。在近几年，这种论述在媒体与政治辩论中格外地获得人们的关注。过去二十五年来，所谓福利条件紧缩政策（增加对求职者的要求来证明其努力重回工作的决心，并对不遵守规定者减少或终止福利）可能是欧洲国家失业福利改革中最突出的特色。这种措施试图回应大众对滥用失业

救济金的关注，然而，却自相矛盾地强化失业救济金是广泛滥用的这种普遍观点。

> 就业碎裂化与工作的不确定性

然而，长期关注失业救济金滥用与有关求职者责任的相关论述盖过失业救济金政策在二十一世纪初面临的主要挑战。失业救济是在劳动市场中构想出来的，其认为工作大量被重新包装成提供男性工人从事更长时间的工时与连续不断的工作。而制造业的增长导致劳动力的“去零工化”，并作为公共政策与集体谈判的目标而积极

>>

追求。相较之下，在今日，服务业为主的富裕民主国家正聚焦在各种非正式雇佣关系类型的激增，尤其是短期或不连续性工作的重新出现，有时候被视为是自我就业。新科技更进一步促进工作分工的碎裂化，加速「零工经济」的到来。各国政府不愿去抵抗这种趋势，并经常积极的促进零工经济来作为增加竞争力与就业率的途径。疲弱的工会组织证实无力抵抗这个潮流，我们正进入零工的新纪元。

今日，对很多人而言，特别是低技术劳工，失业跟补偿形式的失业救济金相比是一种非常不同种类的社会风险，失业不再是长期稳定工作间的偶尔休假，反而逐渐变成或多或少短期、不定期或不安全工作期循环的特征；因此，失业与就业间的界线明显变得模糊。在一个月的第一周与最后一周受聘工作，但其中剩下的时间没有工作的工人，在那个月该被视为是受聘还是失业？当一个工人拥有两个兼职工作，并在失去其中一份工作时，是该以他们仍然拥有工作还是失去另一份工作来定义呢？

> 工作的福利：使工作获得报酬？

在新型劳动市场的背景下，真正体现出失业救济政策面临复杂挑战的趋势，不是普遍转向更为严苛的条件，而是在职社会保障福利更适当却更不均衡的发展。近年来，许多欧洲国家引进并扩张工作福利，无论是作为新兴独立的权益，或是透过修正失业保险或救助金的资格标准，在职福利让人们相信失去工作可能是自己缺乏努力、工作动机或责任感。然而，在职福利的存在仅是因为在当代欧洲劳动市场中，许多求职者的再就业机会获得的报酬与安全性低于失业福利，尽管后者的价值不高。

然而，透过社会福利体系来补充收入是一种自身充满困难的政策。如果要替失业者提供有意义的激励措施，使其重新就业，那在职福利就需要提供工人工作收入外的补充收入，并确保就算新工作马上丢掉，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比当初失业处在更糟的处境中。这为工作与非工作时期之间开启一道大门，使其能够透过永久性的隐性补贴制度无限交替、短期工作或间歇性雇佣关系制度化。然而，普遍基本收入的建议正有这种缺陷。因为在职福利聚焦在低收入者来限制其成本，劳

工时常在追求更高工时与收入时产生更高的有效税率，从而加强工人陷入低薪的处境中。

> 弹性安全或产生稳定性

面对这种实际的政策挑战，数个欧洲国家最近（与2019年法国的失业保险改革一样）宣布在职福利的重大限制，因而再将他们的主要信念从失业者转移至稳定就业的条件下。在维持在职福利的情况下，还引入“在职条件”，试图对在职福利索赔采取更严苛的行为控制，来促进就业发展，这与英国新的普遍信贷制度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都将当代低端劳动市场现实的责任置放在最直接限制他们经济发展的人肩上。

问题真正的症结点在于，很难将现代欧洲福利国家核心的现金转移系统（伴随补偿风险）应用在劳动市场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期的是，工作将会变得毫无保障。「灵活性」是近期将劳动市场弹性与社会保障连结的流行政策理念，这是一种简洁的规范，但对收入维持体系如何能够保护临时雇员不产生螺旋式的成本、意外的后果或这两个情况同时发生，并没有提供实质的引导。只有当欧洲劳动市场能够再次生产基础且稳定的水平，失业保护政策才有意义。这将需要对就业进行更好的监控，而不是对弱势的工人进行更严苛的行为管控。■

来信请至Daniel Clegg
<Daniel.Clegg@ed.ac.uk>

> 走向对立的社会： 当社会政策开始注重主体性

Roland Atzmüll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奥地利

福利制度的发展在欧洲由薪资领导成长模型(福特主义)的积极福利活动, 转为国家紧缩政策而兴起的供应导向的社会政策。从1980至1990年代, 这种计划已经在各国国内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实施, 并且在2008年后更蓬勃发展。这些改革要求个人与其家庭增加自身社会保护的责任, 避免市场主义的风险。在许多国家, 社会保护政策(养老金、健保)私有化是这种发展的典范, 却加剧社会不安全感与不平等。

然而, 个人的自我责任感与主观(工作态度、技能与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与社会危机的活动紧密相关。个人化与主观化的社会政策主要透过所有健全成年人的流动, 来稳固、增加并活化劳动力与资本间的交流。这包括扩大育儿照护与在正规经济中(永久)提高个人的就业能力等活动, 并与财政紧缩政策相对应, 转为人力资本为导向的社会政策, 其代价是更广泛的社会保护与照护的需求, 这意味着要确保社会凝聚力与弱势社会群体融合。这也导致许多国家贫穷阶级的增加与社会排斥的现象加剧, 因为如老年人、身心障碍者、长期病患者等群体被视为非生产性成本因素。

这种变化使得福利服务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其主要任务是透过社会工作与社会教育, 并透过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职业教育与培训(VET)等有争议且矛盾的组合来处理人们就业的问题。福利服务活动越来越多地外包给志愿性组织, 甚至是转移给私人部门, 并透过新型的供资制度(与产出/绩效有关的工资、短期合约等)来严格控制, 这种发展不仅使福利服务的接受者受到难以抗拒的挑战, 这项挑战正是根据市场需求而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这对员工的福利服务带来新的压力与要求, 因为这必须权衡紧缩相关的资金

短缺、对工作质量专业化的要求与客户的期望与反馈。

此议题成为批判性研究新的挑战, 因为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的个人化与主体化已经超越对福利制度去/商业化的关注。这种分析侧重在福利制度以不同方式保护部分劳工阶级免受资本主义下劳动市场的负面社会影响, 并稳定男性为主养家的基本传统家庭形式, 或使妇女能够靠自己获得社会权力并参与有薪工作, 此分析也清楚认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政策的模稜两可, 并显示出凯因斯主义福利国家如何支撑1945年至2008年全球北方经济成长与其消费模型的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 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改革能够描述成透过劳动市场与福利制度的弹性化与自由化来使劳动力重新商品化, 并实现社会保护市场的策略。

尽管转向紧缩政策与供应导向的社会政策表明后者已经受到经济动能的影响, 但新自由主义超过三十年紧缩福利制度与削减社会支出的尝试并没有真正成功的降低大多数国家的总体支出水平。但是, 这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个人获得社会服务的权力是否足够, 与此相反, 社会政策体制正在深远的重组, 其旨在改变个人及其家庭对有薪劳动、扶养子女、职业教育、生产与健康的生活方式、文化规范等的权利义务与其态度。至少从欧洲的角度来, 社会政策活动的个体化与主体化(尽管在国家范围内有所不同)带来福利制度的极端分化, 这是从国际经济失衡、金融资产累积危机与紧缩政策应对随后主权债务危机造成的后果。

福利制度在两极分化中摆盪, 一方面是对在劳动市场地位较低的劳工, 运用工作福利的激励政策,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投资策略。工作福利制

>>

「由于紧缩正因紧缩政策的关系，社会政策朝人力资源导向的社会政策的转移，造成社会保护与照护的需求增加。」

度的重点是将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与贫困者，以及其他没有正当理由(如母亲身份)却没有参与经济活动者，不惜一切代价地纳入劳动市场中。另一方面，社会投资策略越来越重要，其目的是透过生产力支出与其活动来重新合理化公共政策的作用，从而改善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社会投资活动的重点永久适应与重组个人的技能与能力，即人力资本，以及扩大幼儿照顾设施。然而，后者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家庭中的性别分工，而是要动员妇女参与劳动市场。

因此，这些政策并没有改善经济结构，解决资本累积与市场化带来危机与破坏性的影响，而是聚焦在使人们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求以及日益灵活且不稳定的市场。这些发展形成一种主观的危机管理形式，其要求个人适应与提高他们技能的意愿与能力，以及对灵活或全球化市场所需的其他主观特征。因此，解决金融化经济危机与结构性变化破坏性影响的必要性已经转移至

个人身上并缩小他们发展自身能力的可能性。此外，作为一种后波兰时代的社会政策，这些发展将经济融入社会并解决其对社会的影响的任務转移至个人。这正在破坏社会的凝聚力与融合，因此，不仅对国家社会、对于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题也构成了威胁。■

来信请至 Roland Atzmüller
<roland.atzmueller@jku.at>

> 南欧对 家庭政策 的支持

Sigita Doblyte, ISA 贫穷、社会福利、社会政策(RC19)研究委员会, Aroa Tejero, University of Oviedo, 西班牙

公众支持家庭政策的文化价值在南欧各个福利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



时 至今日,个人与福利国家都会面临需要更加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轨迹的挑战。尽管福利国家试图鼓励妇女参与劳动作为一种防止贫困的策略,但家庭在兼顾照顾责任与就业中遇到困难。育儿服务的提供能够外部化(尽管会对父母造成经济负担),或是能够透过政府资助或政府提供育儿服务,这能够视为是更为公平并符合社会投资的逻辑。

> 文化价值与照护的提供

然而,欧洲的福利国家在工作与家庭协调政策在范围上有所不同,特别是南欧国家,其特点通常是保守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且家庭在提

供照顾方面占有核心地位。这几个国家在家庭福利方面的支出大大的少于北欧或其他欧陆国家,而且与其他社会保护政策相比,家庭政策似乎没有获得更多的重视,以福利总支出的百分比来衡量,南欧国家家庭福利的公共支出均低于欧盟的平均,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的比例在2016年位列欧洲最低的五国之中。不过,同年的欧洲社会调查显示地中海国家(义大利、葡萄牙与西班牙)是最支持扩大工作与家庭间协调政策的国家,即使这代表要对所有人课征更高的税收,因为额外的公共服务代表着额外的支出。

各种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对社会政策的态度通常会受社会群体需求与自身利益影响。举例来

>>

说,有小孩的家庭或潜在父母身分的年龄层可能会对更好的家庭服务表示更多的支持。但是,有些研究也强调文化价值对驱动福利国家与其政策的态度的重要性。德国汉堡大学社会学教授 Birgit Pfau-Effinger 博士在他的文章“福利国家政策与照护组成的发展”(2005年)中指出,有关照护的文化观念与国家、家庭与市场的责任被嵌入公共论述中,形成国家的照护组成与政策。

> 南欧国家间的分歧

因此,我们的研究针对需求与文化价值的影响提出这些问题,试图塑造更好的家庭服务水平来提升南欧国家民众支付更高税收的意愿,因为在传统上,这些国家的照护多来自家庭,但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人口增加,导致照护服务需要其他行动者的参与。根据欧洲社会调查的数据,我们强调南欧仍未有足够的照护需求,其证据为家庭依旧提供更高水平的支持照护服务。然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国家对自我利益与文化价值如何影响其态度的方式不尽相同。尽管通常认为南欧国家在传统性别与家庭价值观方面的作用相似,但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证明它们间存在重要的差异,我们认为在某些国家中,为家庭提供更多服务的领域比其他国家更大。

在葡萄牙,总体而言,妇女或母亲的劳动市场参与率非常高,导致不同社会阶级与教育背景的男女在福利支持的水平一致。其伴随的是缺乏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互相影响,而老年世代间的团结度甚至更高。这似乎表明了国家应该采取更为宽松的国家家庭政策。

但是,在意大利,各社会群体认为提供家庭获得更好服务的支持度差异甚大。经济上较无特权或是社会阶级较低的人对家庭政策的支持度明显较低,这可能是意大利相对较高的税收负担造成的。尽管文化价值的方向并不完全符合预期,但也发现明显的影响:将传统与遵从放在首

位的人以及其他拥护社会正义、平等或福利政策等价值观的人对扩大工作与家庭协调政策的支持较低。

有关福利国家逻辑的先验价值(a priori)的未预期效应可能与意大利较高的税收负担有关,其进一步的扩展可能会被视为是对家庭收入的威胁,因此与上述的价值可能相抵触,换句话说,在意大利,家庭仍被视为是最合适的照护机构,而拥护社会正义或平权比较会支持家庭收入保护政策,而非公共育儿服务。的确,2017年欧洲价值观研究表明意大利对传统家庭价值观佔主导地位这种观点有52%同意或坚决同意,其认为若母亲工作,孩子将会受苦,而西班牙支持这种观点为26%。

正如后者暗示的那样,西班牙似乎比起意大利更加明显地摆脱传统性别与家庭文化:拥护社会正义、平等与福利的价值观的个人更愿意为提供更好的家庭服务而支付更高的税收,但遵从传统不会显着影响对福利的支持。此外,对于育有子女的父母的的支持较高,以及三岁以下幼儿在正规托育服务中的比例较低,都显示其在正式的育儿服务中未满足有抚养子女的家庭的照护需求;而经济困难或居住在大城市中的人团结程度较低。

总体而言,尽管葡萄牙的调查结果表明家庭可能变得相对强大,且他们对更好服务的需求可能会成功,但在西班牙,特别是意大利,情况不一定如此。其他社会机构,如雇主,可能会在提供育儿服务或弹性工作的安排方面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尽管在南欧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却仍是非常有限。然而,获得这些利益的不平等正威胁着社会投资的原则。■

来信请至:

Sigita Doblytė <doblytesigita@uniovi.es>

Aroa Tejero <tejeroaroa@uniovi.es>

> 德国的志愿服务： 做善事还是影子经济？

Silke van Dyk, Tine Haubner,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 德国



必要的社会服务过度地委派给志工。
来源:Matthias Zomer/pexels.com.

大为福利制度瓦解、人口变化造成的新需求，以及性别与家庭关系的变化，导致我们正遭受照护与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在妇女较少能够全职作为社会资源的时代，无薪工作的潜在照护（尤其超出家庭）变得越来越重要，且获得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公民越来越常被要求要致力于共同利益，公民参与与志愿工作被视为是新的（再生）资源，且志愿者被誉为是日常生活的英雄。

在此背景下，我们正在东德和西德进行一项实证研究项目，以调查国家如何利用志愿服务来提供服务与照护。我们也对参与者本身与受帮助

的受益者如何体验、解释或塑造感兴趣。尽管在不同领域的志工参与与慈善活动有大量且肯定的研究，但志愿服务的政治经济学经系统性阐明与批判性反映政治、社会与经济蕴含的影响尚未发展。我们使用“影子经济”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正在处理一个非正式工作的领域，其代表一种福利因素并有助创造价值（通过无偿工作的时间）——此超出社会保险缴纳的正常就业范围。因此，具体而言，我们想知道国家对志愿工作的促进、需求与使用多大程度的成为正规就业的替代、非正式与非专业化过程的工具。

在本文中，替代(substitution)一词有时候

>>

代表将先前属于常规工作的活动转移到志愿工作的背景下。在我们的研究中有这样的案例，在学校的全日照护服务中，自愿的“青年陪伴”弥补老师的短缺或是志愿性的家庭协助者取代了国家给予家庭的支持。我们还发现一些刚浮现的需求，这些需求不是透过扩大常规就业机会，而是透过创立新颖的领域或参与模式（如老年照护）来满足。除了直接替代常规工作的模式或预防常规就业的扩张，我们的研究更显示替代的效用，正如受侵蚀的家庭照护或缺乏熟练劳工（如护理、行业或法律咨询）也因为志工而获得补偿。

尽管志愿服务与公民参与通常受到全国大众的高度讚扬，但透过这样的发展，我们发现专业化程度正在降低，没有充分训练过的门外汉实际上从事教育、家庭帮助、老年照护、给难民的德文课程或法律咨询等专业工作。非专业的服务主要是针对那些欠缺资源的人，借此来弥补国家补助缺口，或是私下购买专业服务的新兴需求。因此，在福利国家中，使用志愿服务不会影响公民的平等权益，相反的，人们能够察觉到“为穷人提供的贫困服务”这种无法负担专业援助的出现。

但是，不仅是提供服务的品质会出现问题，而且志工的处境也在某几个领域变成准雇员，却没有相关的社会权利。特别是在期望志愿服务者要可靠、稳定且经验丰富的领域中，如老人照护、全日学校照护工作或是与身心障碍者一同工作，所谓「志愿性契约」或是超出费用核销范围的经费补助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津贴通常远低于最低薪资，与此同时，劳工与集体谈判的标准也正受破坏。由此来看，至少在某些符合普遍利益的社会服务领域中，此种受到高讚赏的参与也促成了工作的非正规化与不稳定化。

特别是在东德，公民参与跟志愿工作与劳动市场紧密相关，这意味着失业者从事公民参与与志工服务，希望能够借此重返劳动市场。在跟志工与专家的访谈中，我们还发现有将志愿参与作

为有偿工作的象征性替代的论述。我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实证结果是就业中心（job centers）的工作，有时候会排遣长期失业者参加公民参与的活动。此外，新（东德）和旧（西德）联邦州之间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区别：在西德，人们对志愿参与货币化颇为批评，因为（根据广泛的观点）这将破坏志愿服务的特性与原创性；东德的情况则不同：根据日常工作获得合理薪资酬劳的概念，志愿参与的货币补偿被认为是没问题且合法的。在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强大劳动性质的后果显而易见，其中有国家指导的志愿工作与非正式的社区互助与团结，但都没有典型公民参与的概念与实践。

我们研究侧重志愿工作与参与的不同领域：难民与邻里互助、老人照护、学校参与、志愿消防队、多待家庭的参与与地方交通服务，这只是几个最重要的领域。在所有领域都有问题，但也完全没有问题。在有问题的发展上，我们正在观察社会再生产的新纪元，我们将其称为“社区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家庭外的社会社区越来越常被用为克服再生产危机的新资源。但是，我们对国家使用志愿工作的批评观点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应该毫无例外的承担所有（社会）任务，关于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转移到志愿工作的领域，我们的批评是针对生活中依靠志愿服务支持的基础机会的领域，而不是保障社会的权利。■

來信請至：

Silke van Dyk <silke.vandyk@uni-jena.de>
Tine Haubner <tine.haubner@uni-jena.de>

> 欧盟会维持其社会支柱吗？

Beatrice Car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Florence, 义大利



2017年11月签署的《欧洲社会权利支柱》代表着欧盟委员会的社会倡议。
来源: 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

2017年11月17日，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峰会的主席共同签署一项政治宣言，其中记载欧盟所拥护并促进的社会原则，其标题为《欧洲社会权利支柱》（简称支柱计划或EPSR）。这代表着尚-克劳德·荣克（Jean-Claude Juncker）领导欧盟委员会的旗舰社会倡议，他将「欧洲社会」的概念带回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来辩论。自从荣克主席2014年上台后，他将欧洲社会层面的议题置于与过去不同的论述中：尽管还是要负责福利与社会政策的生产，新委员会公开承认有必要就其对社会的影响重新考虑未来的政策，其不仅涉及经济和劳动市场，还涉及社会平等、公平与包容。

> 漫长且争议不断的政策制定过程

正是在这种革新的论述与打破先前政策模式的意愿下（在紧缩的影响完全暴露出来时），支柱计划在2015年9月的荣克国情咨文演讲中被提出。为期两年的拟定阶段后正式公布，2016年3月，委员会发布该文件的初步纲要并开启一个特别漫长且广泛的公共咨询阶段，该阶段一直维持至该年年底。咨询的结果明显地促使不同利益关系人能够更大程度的由下自上参与文案的撰写，公众能够利用的意见书与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与辩论会报告使我们能够在最终档案的调查中反映出各种偏好，这正是理解该计划未来可能发展的关键。

>>

公众谘询结果的分析显示的是，制定过程中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存在极大的差异。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发现两个主要参与者间存在鸿沟：一方面，民间社会组织、工业联合会与欧洲议会强调在发生经济冲击时，要确保有一个「社会保护底线」来保障公民与工人的权利，并呼吁在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同时呼吁采取各种政策手段来实施支柱计划，包含欧盟新法与超国家基金。另一方面，雇主、商业协会与几个会员国关注社会包容与保护本身的强调（与劳动市场功能没有直接关连），并强烈反对在社会领域中采用新法或筹资机制。这组政策参与者透过「软性」政策协调机制与辅助性原则来促进进一步的融合。

> 象征性价值的平衡行为

检视档案的最终版本，我们能够看到委员会设法平衡以下各方的观点：在论证的层面上，欧盟机构对社会层面的论述有所改变，不仅放弃紧缩政策立场，也放弃「社会投资」的概念（如2013年《社会投资计划》中的内容），并转向权益保护的领域，将社会包容与平等作为独立的目标，从而遵循民间社会组织与工会的建议。然而，拟议将支柱计划付诸实践的文书，却仅仅依靠非约束性的协调与监督措施就接受商业部门与一些会员国所倡导的立场。尽管通常各种参与者能够详细了解最终成果，但是EPSR倡议的结果只是一份政治性、宣言性的档案，其中列举欧盟三大主要机构认可的一些原则和期望，唯一的创新政策是将一套新的社会指标（社会计分板）宽松的整合进整个宏观经济协调体系中。到目前为止，支柱计划的附加价值还处在象征性阶段，而实现其固有潜力来激发欧盟社会层面的变化，则取决于计划参与者的政治意愿。

欧洲议会（EP）选举的结果与2019年新任命的理事在这方面仅提供部分的前景。在欧盟等级，官僚和政治团体似乎都理解从超国家角度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而在欧洲议会选举的宣言中，所有欧洲政党都认为社会领域（social

domain）跟2014年一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特别是欧洲社会党、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前两个政党也直接提及支柱计划）。此外，新任命的委员会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在她的介绍演讲和政治指导方针中明确提到EPSR，并提出采用一项「行动计划」来执行。然而，各个会员国的角色在支柱计划倡议的后续行动中同样至关重要，正如其制定和通过时一样，因此，考量国家等级的发展极为重要。

> 会员国的角色：以义大利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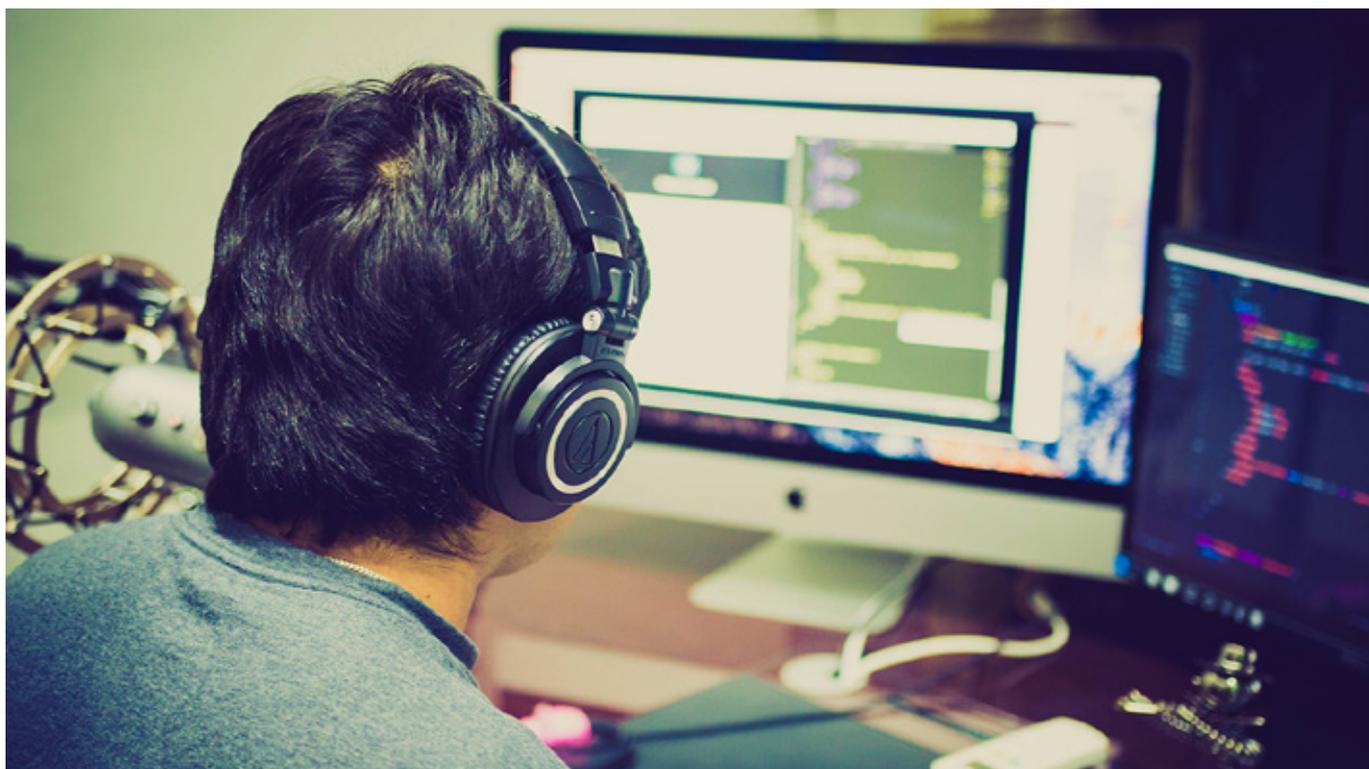
在意大利进行欧洲议会选举的前夕，《欧洲社会权利的支柱》完全没有进行宣言或公开讨论，而赞成加强欧盟社会影响力的政党（例如欧洲自由民主联盟、欧盟绿党与左翼党）都在选举中惨败。这几个政党还根据各自所属的欧盟党派来制定计划，并在竞选活动中解决与国家或超国家有关的议题。即使上次欧洲议会选举因国内政治议程的影响而几乎没有「欧洲化」，但这个现象不仅是在意大利，而是所有会员国都是如此，因此，就最终选举结果而言，意大利的案例可能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事实上，欧洲自由民主联盟与欧盟绿党，其亲欧盟一体化立场，总體上都有在史特拉斯堡获得新的席位，这有可能抵消民族主义者和疑欧党派的选票。但是，在如社会类的政策领域中，成员国的角色仍然占主导地位，欧洲议会出现的高度政治分裂使欧盟社会层面的未来更充斥著不确定性。同时，这能够为超国家行为者，特别是新成立的委员会创造机会，在其前任奠定的支柱计划基础上，促进社会领域的更紧密的融合。■

来信请至 Beatrice Carella

<beatrice.carella@sns.it>

> 人工智能是「谁的智能」?

Paola Tubaro,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Université Paris-Saclay, 法国



唯有透过真实的人类,人工智能才能成为「具有智能的」。
来源:Hitesh Choudhary/pexels.com

现今的人工智能(AI)之所以有如此卓越的发展成果,其实是立基于一大群人的「微型工作」之上——这些人会将物件以图像的方式标记、记录商业的收据、翻译文字,并将他们大声朗读短句的声音录下来。如此简单且重复性高的任务通常门槛不高,薪水少至几分钱。负责处理这些工作的人也不是正式的雇员,而是按件计酬的分包商之下的员工,他们会借由专门的网页将工作分发,并透过智慧型手机或笔电远端执行这些工作。

那么,这些有如影子大军般的工人是如何协助AI呢?以Siri或是Alexa这类以AI科技驱动的语音助理为例,在他们能够辨认、理解使用者的要求之前,语音助理必须先接收大量的人类语音作

为范本,例如「今天天气如何?」。在接收这些范例之后,电脑会「学」到,哪些句子虽然有着音色、语调,甚至地方口音或背景音的差异,指的却仍是相同的意思,并接着变得能够辨认新的、不同使用者的类似要求。负责处理这类微型工作的员工,除了需要制造这些语音范本,将他们询问天气如何等等语句的声音录下来之外,AI制作者也需要他们来协助测试这些「智慧型」助理的功能是否如预期。

微型工作的模式最早是在2000年代初期,因亚马逊公司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而变得普及。由亚马逊内部的员工先负责整理产品清单,再将清单内容开放给外面的客户,而这些客户会再将这些HITs(Human Intelli-
>>

gence Tasks)发布在网路平台上让微型工作者执行。亚马逊给了这样的设计一个再适合不过的称呼——「人工的人工智能」,强调在遇到一些电脑无法处理得比人类更有效率的工作时,将这些工作外包反而是更好的选择。现在很多其他的网页或应用程序也依循亚马逊的例子提出不同的方案,例如澳洲的Appen、德国的Clickworker、美国的Lionbridge和Microworkers等,族繁不及备载。

这些微型工作者身处在哪些地区呢?由于一部分的工作在线上就能完成、也不需要真的待在特定的空间内(例如从一堆沙拉的图片里辨认出番茄的图片),许多工作者生活在工资较低的国家。在这个情况下,微型工作的地理分布,也再现了外包产业广为人知的模式。然而,也有一部分的工作因为需要地方的知识或技能而无法在海外完成,举例来说,由于语音助理的功能会销售至不同国家,为语音助理录制的语句范本,就有赖能使用相应国家的语言、甚至其腔调和方言的工作者来完成,而多数「土耳其机器人」的工作者也都是来自美国。我们去年也在法国这个同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设置了一个名为「数位平台劳工」(DiPLab)的研究计划,并找到了许多的微型工作者。

在法国这样的地方执行微型工作的,又是什么人呢?我们的问卷显示,这些人不是只有学生或是千禧世代: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介于25到44岁之间,而且他们在进行这些线上的微型工作之外,同时还有着另一个例如卫生、教育、公共服务等各种性质的行业作为主要工作,微型工作则是他们赚取额外收入的来源。很讽刺的是,在那些有着较高门槛的微型工作里面,微型工作者相比于一般大众其实有着更高的教育程度:在法国,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微型工作者至少是有大学学士学位的。另外,有比一半再多一点的微型工作者是普遍已经有家庭的女性——由于她们比其男人更能从事兼职工作,且通常更需要依赖另一半的收入、也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务劳动上,她们会利用工作与家务之间的时间来进行线上的微型工作。为工作带来的额外收入当然是好的,但附加于正式工作以及家务劳动之上的额外负担也成为随之而来的代价,使得她们的休閒时间所剩无几。

微型工作揭示了一个台面下颇具规模的经济问题。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法国微型工作者生活

于贫穷线之下、薪水只有全国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这样的人口却仅佔总人口数的不到百分之十。与这样的背景相对的是,线上微型工作其实是想要试着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提及,他们之所以投入微型工作,其中一个原因便是需要钱;然而法国的微型工作者的月收入,却有着不平均的分配。当一部分在工作上较为「活跃」的人借全职(或几乎全职)的微型工作能够有1500到2000欧元的月收入,绝大多数「看情况」上工的微型工作者每个月的收入却比起平均少了21欧元。

如果说微型工作对于特定的人而言——对于那些在劳动市场中求职选项较少、或是需要较弹性地安排工作时间的人而言(例如前述那些需负起家庭照护责任的人),有机会成为提供他们生活支持的方式,其却也存在着特定的风险。微型工作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护机制,没有健康保险、也没有退休的福利。在现况下,微型工作的经验并不能直接地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带来助益:即便你已经在其中一个微型工作平台上获取了一定程度的工作声誉,你也没有办法将之转换到另一个平台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微型工作是会带给工作者负面情绪的。他们时常不知道自己的顾客是谁、也不清楚工作案的目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像是失去了意义一般。就像我们的其中一个调查对象,由于并不理解自己的工作对于AI发展的贡献,他时常感到疑惑:「到底为什么我要在图片里的番茄周围划出一个圆?」此外,当完成的工作案被顾客驳回、并因此而不支薪的时候,微型工作者没有办法对这样的驳回提出意见,也无法知道被驳回的原因。甚至,微型工作者们是在分离的空间里面进行单独作业的。由于他们各自在家里工作,没有一般办公场所会有共同休息区,即便是在网路上,也没有微型工作者专属的网路空间可以提供互动的机会。不管是对于行动者或是工会的能动性来说,这样的基础设施都是必要的。

由于微型工作是推动AI这项前沿科技发展的要素之一,且其从事者多数处于较弱势的处境,针对其带来的问题,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可能的应对方式。微型工作的网路平台与应用程序等公司,应增进其运作透明度,并提供予工作者适当的人际支持服务;工会和政策制定者也应为非典工作者创造更多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

来信请至 Paola Tubaro <paola.tubaro@lri.fr>

> 新奇博物馆

Lévio Scattolini, 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UERJ), 巴西



电子加密货币为一个更加民主的金融体系带来了希望。
来源: Worldspectrum/pexels.com.

质疑着「资本主义如今还能对人类文明的成就带来什么？」的人们，在面对科技的发展愿景，例如所谓的科技／资讯时代时，也倾向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对这些人而言，人工智能、机械学习、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加密电子货币、甚至智慧型手机，这些人类心灵与身体的衍伸物，并不被解读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反而是被视为未来时代的封闭体制。即便找到证据证明了这样的假设，也无法回答一个更为久远而重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看见新的体制和方案与最初为其赋予生命的理念渐行渐远，最终又以新的样貌重构过去？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许多层面，而我想要强调其中一个较为迫切且具体的层面，以揭示在这类争论中通常会被忽略的、根源于社会的面向。金融体系在全球各国默许及支持下，作出难以想像的滥用行为，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而在创新理念中，最先广为人知的一种电子加密货币比特币是针对上述滥用行为的一种反抗措施。事实上，作为抗议号角，《泰晤士报》一份关于英国政府意图在2009年1月3日对银行实施第二轮救助的报导便被写进比特币的原始程序码，作为比特币发行日的时间戳记。此外，这项科技结构确实是为了将掌控金融系统的权力从那些「中介人」身上拔除，重新分配到一般大众手中而设计。

>>

传统金融体系被认为问题在于，其在交易验证和货币发行上完全倚赖着对中央机构的信任。换句话说，正是那些如私人或中央银行的金融机构，要负责确保当A拥有特定数量的金钱、并将这些数量的金钱汇给B之后，便不能再次使用这些金钱。我们将执行特定任务的权威赋予金融机构，并且期待他们会做到最好。这对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成问题，因为这些事情难以被察觉、且离日常生活太过遥远；然而这对于城邦政府而言——特别是在一个所有事物都是为了被交易而生产以获得金钱的社会型态下——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一个任何想要加入的人都能够触及，并能够将交易透过共同的协调机制记录和验证的去中心化分类总帐网路，这样的想法便显得颇为适切且有趣。若是考虑到这个网路的特性——不仅可容错、内建了无法调降的2100万货币发行量，甚至在超过十一年之间经过多次攻击，却仍然没有太大程度的结构损伤——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比特币的分配系统协调实在建构地太过完美，以致于其发展成了一项独立的科技，以及一系列被称为区块链的装置。

2019年，比特币在市场价值上抵达了2.25兆美元的高峰，并在一年内有超过1.2亿笔的交易被记录在原始的数位网路中。但我们应该于此就下定论，将其视为一个对金融体系掀起革命、赋予一般人民权力的存在吗？先别急着这么做。从2014年至今，在经过不稳定和充满波折的开端后，金融机构、企业和较大的投资者都将目标转移至电子加密货币上，开始大量地投资和研究这项科技。「一般使用者成为多数并掌控比特币的网路」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遭遇了重大的挑战。如今比特币的「挖矿」被大规模的「农场」所掌握——农场一词指的是那些拥有机器、能源、资源(或说资本)，而因此能将「工作量验证(proof of work)」处理得更好的大型复合公司。值得一提的是，Facebook最近才宣布要和一些全球最大的企业合作创造自己的电子加密

货币「Libra」，而这样做的目的则在于达成不管是比特币还是其他种加密货币都无法做到的：让这样的货币变得普及。这意味着我们将会目睹，一个数十年来一直不当地从数十亿人的手中偷取资讯、同时也是世上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大企业合作以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中央银行，其不只是私有的、还知道使用者的所有资讯。

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批判分析作为身处这个世界中的我们得以适当地定位自身行动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就像前面所强调的，从务实的角度来说，现今的金融体系的问题大致上在于，人们倚赖着对于中央机构作为「中介者」的信任，并由此而发展出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重新创造一个开放且去中心的「信任的网路」。然而，会不会其实，问题并非来自金融体系的形式，而是出自这个体系的内容？我想说的是，我们怎么可能有办法将我们的时间与金钱托付于社会中最庞大的中介者上，同时试图借此创造一个「去中介者的社会」？金钱不就是中央查核机构不断成长茁壮的源头吗？不就是不断地累积、获取金钱的内在逻辑，造成了集中化与中心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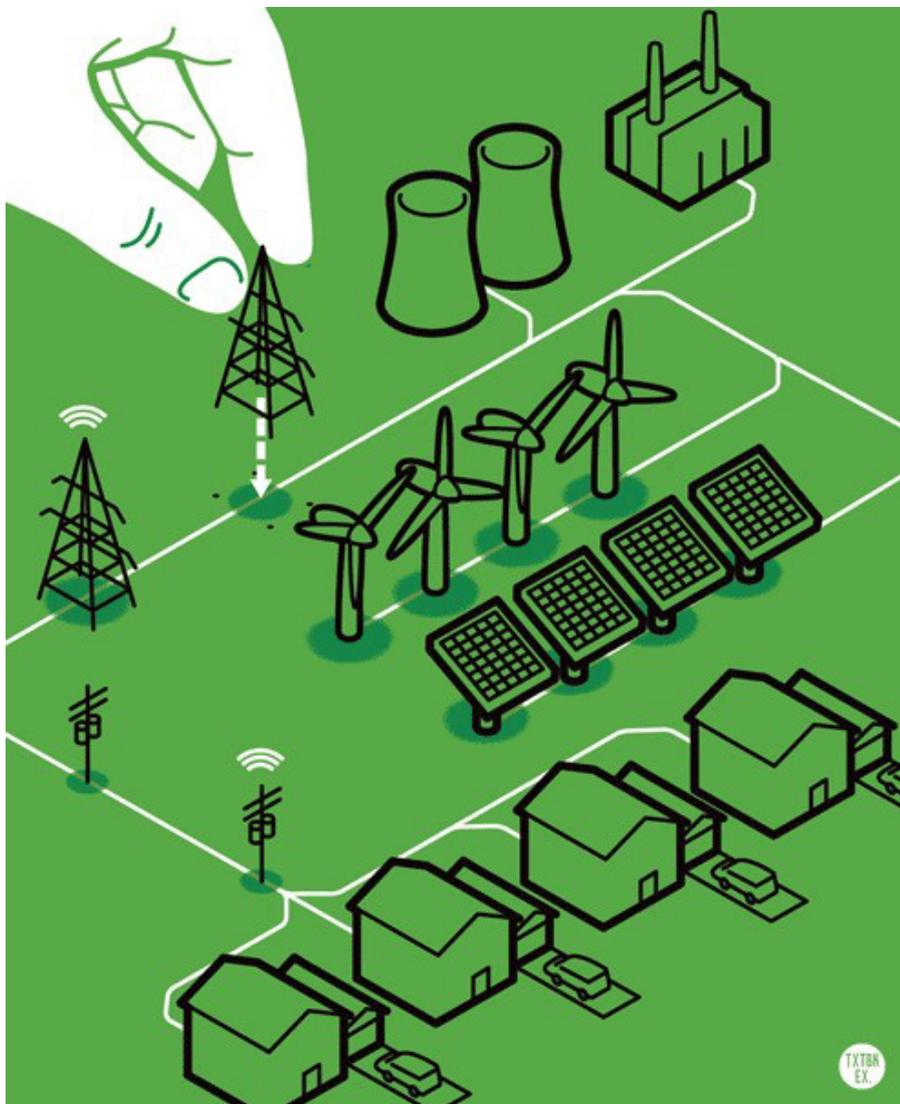
我并不是要说比特币或是其他的那数千种电子加密货币是毫无价值的，而是想要指出，若我们将社会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视作理所当然，若我们拒绝看见金钱对于社会互动的影响，这些新的科技将会因为总是不断地重建过去，而注定走向毁灭，那些必要的社会条件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是无法自我再制的。在揭示了物价的升值的矛盾变化，我们也许能够对于这个议题有更完善的理解，并由此找出更好的解决方式、结构或是科技，引领我们走向不同的未来：生产生活的一种新的物质过程。■

来信请至 Lévio Scattolini
<leviosj@gmail.com>

> 数位化社会的永续 需要什么？

Felix Sühlmann-Faul, 德国

再生能源的智能分配涉及到数位化。
来源：James Provost/Flickr。
保留部分权力。



世界上有许多事物能告诉我们数位化有着怎样的意涵。举唱片行为例，我们都曾会在电台上听到某些我们觉得喜欢的音乐，或是因为被朋友推荐，而来到唱片行买下某些音乐商品。其作为一种物质上的存在，成为了我们的财产。如此日常的举动在如今已经几乎消失了。立足于平台商业模式之上的串流服务，让我们得以直接取得数以万计的歌曲，取代了过去的唱片行。音乐产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一个造成这项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如今产品的核心意义由数据掌握。串流平台的商业模式在多数情况里会透过蒐集使用者的许多资讯来完成运作，例如我们习惯听的音乐

种类、什么时候听、听的频率、在哪里听这些音乐；或是我们的性别、有没有小孩、住在哪里、家庭收入。

这些资讯便是这类平台能获得重大成功的原因：他们对于我们的喜好和想法有深刻的了解，并能够预测我们的行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这些服务会随个人的差异而调整。平台也会将这些搜集到的资讯转卖给广告公司，以针对使用者投放其可能更容易有兴趣阅览的广告内容。上述的这些现象，便是现代数位化的其中一个重要意涵：资本主义与科技之间有着强大的连结。

>>

这和数位化时常无法与永续性达到平衡有直接的关系。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对联合国的报告中提到，「永续发展指的是能够在符合现下需求的同时，也能兼顾未来世代需求的发展方式。」也因此，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的下一代，都应该享有过上「好的生活」的权力。这意味着什么？——这一个问题必然与文化有关。在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的理念形塑下，西方社会由相对应的价值组成，像是民主基本权利、自决权、多元性、隐私权、环境权，以及任何异议下的「自由」。然而这些价值大部分也都受到数位化的影响，而数位化是被。举例来说，借由完全地掌握使用者的各种资讯，而得以成功的串流平台，并没有办法确保我们的隐私权得到保障。更进一步来说，环境的保护一直以来都不是经济利益所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在进入数位化时代后也未曾改变。

数位化倚赖于原物料的生产与运送，以及相关装置与基础设施的共同运作。仅仅是数位装置的能量使用量就占了全球电力消耗的10%。如果数位化的趋势持续延展，这个数值会在2025年时来到20%；相关资讯与通讯科技的生产与使用所产出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例，也会从3.7%提升至8%。原物料的生产会在生产国带来极度严重、且不易消失的问题。刚果共和国是其中一个显着的例子。刚果是钨、钽、锡、钴、黄金的大出口国，这些原料对于制造硬体数位设备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想当然的，生产这些原料会造成一些常见的环境问题，例如地层侵蚀、地下水中毒、物种灭绝。不只如此，其在社会层面更是有着巨大的影响：一场血腥的内战让国家变得千疮百孔。数个反抗军队将这场战火延烧了30年，导致了数百万的人民伤亡。生产硬体数位设备所需原料的矿场如今被反叛势力控制，并以原料的销售所得来供给军火费用。这便是「战争矿物」一词的来源，其带来了一连串的苦难：饥饿、性暴力、疾病、奴隶、童军。

可喜的是，在另一方面，有许多地区的永续唯有透过数位化工具才能够达成。最一开始的例子是人们渐渐开始倾向使用再生能源。由于再生能源的生产具有去中心、难以预测、在一日当中的不同时间区段中出现、有时只有很小的生产量等等特性，若要有效地利用再生能源，数位化是无法被忽视的。如此善变的再生能源，需

要在及短的时间内储存与分配，而这些工作只有透过能够自我学习的电脑科技才能办到。

另一个例子是永续的交通运输。要让石油运输工具、市中心的大车潮以及细粉尘污染，就需要大量地减少使用汽车的乘客。然而对于替代的运输方案，人们却时常有很大的资讯落差。这些运输方式有不同的供给者、不同的收费、不同的移动时长等等，人们难以同时取得这么多的资讯。不过身处于一个智慧型手机已经如此普遍的社会，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在德国已经有许多的研究计划处理了这个问题：透过增加一些当地公共运输业者的手机应用程序、并在其中加入其他当地不同业者的交通资讯，人们可以直接比对共享汽车、单车租借、公车、火车等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并能知道旅途需要多少时间、哪种方案有最便宜的价格、要如何结合不同种的运输工具抵达目的地，甚至能透过应用程序预定票券或付费。数位化让永续旅行变得更加容易。

> 数位化时代将我们置于怎样的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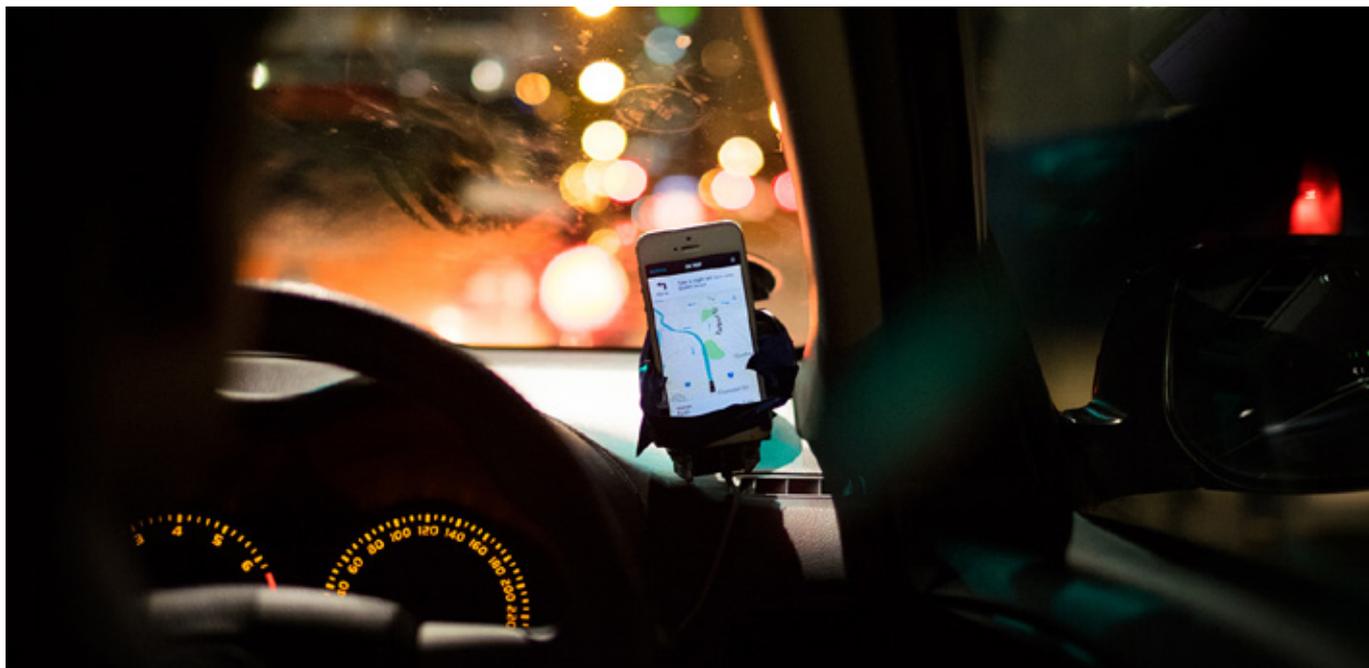
有许多研究显示，永续性对社会而言有其重要性。然而实务操作上，永续并不是一件容易达成的事情。人们通常难以立刻就抛弃汽车、或突然就不搭飞机，这就是政治力必须介入的时候了。可以操作一些简单的政策，如降低购买数位设备的税收，或是立法规定所有的电子产品都要是在修复后重复使用的。然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应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原物料。对于产出这些矿物的国家，应该要有与其遭受的环境与社会伤害相对应的经济补偿。这样的措施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借由课取更高的原料税收，其也能带来后增长经济的效益。

数位化的社会将创造一种更为永续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降低能量消耗以及环境破坏的风险，然而这是一项需要协力完成的事情。不只是完善的法条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民作为个体，也应透过政治参与、投票、并主动适应这样的生活，以呼应数位化的社会趋势。永续的基础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条件，但数位化则会降低消费的门槛。我们需要特别留心注意这个事态的发展。■

來信請至Felix Sühlmann-Faul
<kontakt@suehlmann-faul.com>

> 公平工作组织： 零工经济的行动研究

Srujana Katta, Kelle Howson, Mark Graham,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国



过去十年里，商业性的点对点乘车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交通工具。
来源 Noel Tock/Flickr. CC BY-NC 2.0.

来自印度的公司 Ola Cabs 是一间共享乘车服务的厂商，这类公司的商业模式倚赖于使用数位平台来为劳动的供给者与需求者进行配对，并且在全球都有增长的趋势。Ola Cabs 的手机应用程序提供有需求的乘客和附近驾驶联系的功能。此种商业劳动平台便是我们所说的「零工经济」，公司会以一些数位平台为媒介，和有工作需求的人签下合约，执行短期、不固定性质的「零工」，而这些平台通常有着一套严密保护的演算法为运行基础。零工经济以演算法分配、管理雇佣状况的模式，为其拓展了多方面的经济活动，涵盖了共享乘车、包裹运送服务、家务劳动工作和一般自由业等等。

Ola Cabs 作为一个典型的零工经济企业，利用自由、弹性等劳动叙事，招募「驾驶夥伴」来

为公司开车。Ola Cabs 在其网站上向抱持理想的驾驶们保证这份工作有着「弹性工作时间」、「工作自由」以及能「保有尊严」等条件，以符合零工经济最初设置的标语。除了让人们在旗下驾驶自己的车之外，Ola Cabs 也会以一天10到16美金的价格将汽车租赁给没有车的人。这些充满驾驶于是能够在缴交56美金左右的、无法退还的首期款，以及约293到432美金的保证金之后，「零风险地驾车」。

在 Ola Cabs 的叙事中，驾驶人作为自我赋权的野心家，将自身从传统工作的束缚中解放，并周旋于有趣的任务之间。零工工作表面上呈现出能够自我管理、有效利用现有资产、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庭或追求其他事情等等较吸引人的一面；其魅力来自于提供了工作者对于职业与个人生活的各方面有更大掌握的可能。然而现实通

常与这些承诺有天壤之别。由人类老板进行公开管理的方式，已经被更隐蔽、且于现代更普遍被使用的演算法管理模式所取代。

在2019年十二月，经济时报的一份报导指出，Ola Cabs 在遭到一位乘客投诉驾驶在开车时睡着、差点出车祸之后，将一位孟买的驾驶停业。驾驶表示他在这之前已经驾驶了超过二十个小时。在表面上，Ola Cabs 将其停业是为了保证乘客及驾驶安全的合理处置；然而此事件也显示了共享乘车服务，或是整体的零工经济，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潜在结构问题——低薪资、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相关规范的缺乏。报导中引用了某劳动组织的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样的情况：「他们如果不像是14、15小时这样长时间驾驶的话，就没有办法负担 Ola、Uber 等公司所设置的每日平台使用费。」

零工经济平台通常宣称其仅是将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人，和想要购买的人牵线的科技公司而已。根据这样的逻辑，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中，平台都将零工工作者分类为「独立承包商」、「自营职业者」或同等人员，而不是受雇员工。这样的分类方式掩盖了实际上平台与工作者间的控制关系——平台订定了工作条款与给薪方式，并施行高效的网路治理。在合约中动的这些手脚，导致越来越多的零工工作者无法被涵盖在劳动法条中，并因此无法受到像是病假、国定假日支薪，或是退休金等等劳动权益的保障。平台会将营业成本转嫁到工作者身上，例如汽车的租借费、维修费、保险费、燃料费，工作者还要负责计算并缴纳税金；在公司不断扩展规模导致薪水有减少的趋

势，以及被设计会给予工时较长者奖励的游戏化数位接口下，原本应有选择工作时段自由也受到限缩。更糟的是，当劳动力供给过剩造成某些时段的工作机会太少、等待下一份工作时不支薪的等待时间延长，平台也没有义务保证工作者的最低工作量。劳动力过剩同时也意味着顾客在需要服务时很少需要经过等待。上述的种种因素使得工作者被迫需要工作更长的时段，也因而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危及他人和自身的安全，就像这位差点睡着的 Ola 驾驶员一样。

在 Ola Cabs 和印度发生的这些事情都不是特例，低薪、过劳、暴露于高风险的工作环境——类似的现象于全球的零工经济中重复上演。上述情况可以、也正透过如针对员工就业状况以及平台之义务设置条例等方式得到处理。为这些措施奠下基础的，是由下而上的集体行动、工人组织，以及第三方试图唤起大众对此议题的意识和提倡更为公平的作为所付出的努力。

正是依循后者的精神，牛津大学下的行动研究计划「公平工作组织」在2018年成立，社会科学家与劳动律师在其中合作、试图为零工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提供解方。在聚集了来自亚洲、非洲、欧洲，超过300位零工工作者的案例之后，我们得以发展出五个关于平台工作的公平原则：公平的薪水、公平的劳动环境、公平的合约、公平的管理、公平的代表。

我们每年会发表针对零工经济平台的研究，其内容包含了劳工与管理阶层人员的访谈，以评估平台是否违反这些原则。接着我们会以十分为

Principle 1: Fair pay
Workers, irrespective of their employment classification should earn a decent income in their home jurisdiction after taking account of work-related costs.

Principle 2: Fair Conditions
Platforms should have policies in place to protect workers from foundational risks arising from the processes of work and should take proactive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workers.

Principle 3: Fair Contracts
Terms and conditions should be transparent, concise, and provided to workers in an accessible form.
The party contracting with the worker must be subject to local law and must be identified in the contract. If workers are genuinely self-employed, terms of service are free of clauses which unreasonably exclude lia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platform.

Principle 4: Fair Management
There should be documented processes for workers to be heard, to appeal and understand decisions affecting them.
Workers must have a clear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to appeal management decisions or deactivation. The use of algorithms must be transparent and result in fair outcomes for workers. There should be an identifiable and documented policy that ensures equality in the way workers are managed on a platform.

Principle 5: Fair Representation
Platforms should provide a documented process through which worker voice can be expressed. Irrespective of their employment classification, worker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organize in collective bodies, and platforms should be prepared to cooperate and negotiate with them.

公平工作原则。
来源：公平工作组织。

2019年南非与印度公平工作排行榜。
来源：公平工作组织。



满分为这些平台打上个别的和相对于其他平台的分数，并在「公平排行榜」上分别显示这两种分数。我们会依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差异调整五项原则的门槛，例如「公平的薪水」这样的原则在评估不同地区时就会有不同的诠释方式。较高分数的平台会获得使用我们的风筝标记的权利，以表示其是公平的资方。

我们期望能借此提供劳工、企业、消费者以及监管机关一套平台经济的支持系统，劳工赋权、永续经营、工作机会增加等展望并得以被想像、实践。

在收到乘客的投诉后，Ola Cabs 对过劳的驾驶采取了立即的纪律处分和纠正措施，包含要求其参加辅导。然而也许并不是全数的责任都该被丢到这位驾驶头上。要劝一个人不要那么疲惫，或是不要那么依赖不稳定的收入来源，是不可能的事情。若 Ola Cabs 或是其他类似的平台在进行员工管理时更积极地将公平工作原则纳入考量，零工工作者也许便能有更安全与公平的工作处境。若能有公平的净收入(薪水)，且平台没有加班奖金这类会针对过劳给予奖励的制度(劳动环境)，驾驶较可能选择结束一天的工作，

而不是一整天的劳累之后开始另一份工作。如果能更清楚地向工作者说明付款的义务，他们便能在签下合约之前有机会审慎衡量自己的选择(合约)。当平台具有互动机制的正当程序(管理)，工作者便能对其处分提出申诉、并由专人审理案件。能拥有平台的独立集体机构认证(代表)的工作者，也更有可能能够要求更合理的合约。相反地，Ola Cabs 和多数其他平台则没有做到这些；他们不只将成本和风险转嫁在工作者身上，还让工作者成为不安全工作环境的咎责对象。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希望能透过公平工作原则来强调，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在现代的平台经济中是不可被接受的、不必要且不自然的现象。在越来越多的劳动领域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灵活的应对措施，为这些难以争取的劳动权益奠下基础。即便现况看来难以改变、我们也难以触及这些平台，但他们其实是很在乎大众的声音的。对于想像和实现更公平的未来，平台的使用者们(包括工作者和消费者)有着我们难以想像的影响力。

来信请至

Srujana Katta <srujana.katta@oii.ox.ac.uk>
Kelle Howson <kelle.howson@oii.ox.ac.uk>
Mark Graham <mark.graham@oii.ox.ac.uk>

> 资本主义、阶级、 争论

Donatella della Port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Florence, 义大利



2019年香港革命。来源:Studio Incendo/
Flickr. 保留部分权利。

今年是1969年「热秋运动」(Hot Autumn)的第五十周年纪念日，使许多像是Colin Crouch或是Alessandro Pizzorno的社会学家谈论「阶级斗争的复甦」，这告示着许多全球大规模抗议浪潮的出现。这包含着数百万人的抗议游行以及公民不服从的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在黎巴嫩、智利、加泰隆尼亚还有香港等遥远的各地同时爆发。在2019年的「热秋运动」中，对抗极端不平等与腐败菁英的斗争，与2010年开始的反财政紧缩运动(anti-austerity protests)及二十一世纪初的全球公正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产生了共鸣。

当财政紧缩的抗议定期地出现并接近2010年代尾声时，一些针对女性暴力、全球暖化抗议动员的风声盖过了这些先前运动的架构，并将这些议题定位在对现有社会与政治关系的批评之中。其中，流动网路(fluid networks)连接了群体，而这时常发生在第一次动员群众上。而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又称气候大罢课)、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与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等社会运动将女性暴力及自然环境的破坏与资本家的剥削议题联系起来。2019年热秋运动的大

>>

规模动员不仅深植于国家分歧上，同时也对全球资本主义下增加社会不平等、限缩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的发展表达怒火。而有时，在街道与法院上残酷镇压公民不服从的行为，引爆了政治化螺旋中更长远的激进抗议。

尽管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危机带来了许多不满，人们时常以分裂形式来表达抗议，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观念及研究主题，在社会运动的研究中仍处于边缘地带，对于阶级以及阶级冲突的分析也是如此。然而，自从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后，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冲突的结构基础及其在制度化政治(尤其是争议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中的表达。关于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ies)、资源调集(resource mobilization)以及框架过程角色的公认假设，则是需要考虑到抗议活动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以进行更动。如同我在随后的文章中所论证的那样，为了将资本主义带回抗议活动的分析之中，我们须要将有关社会运动的文献与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学术贡献联系起来。

> 资本主义及新型社会运动的转变

劳工运动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的长期转变导致了产业劳工及其阶级意识、组织能力的下降。与此相呼应的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证实了工厂外部分裂的扩张、新的集体身份的形成，以及对社会及市场中阶级制度的抵抗。特别是自

1970年代以来，当评估阶级分裂的状况已平静下来之后，事实上一些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正研究表明了他们对于后工业(post-industrial)与后物质(post-materialist)新运动特征的关注。

从理论上谈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像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Alberto Melucci和Alain Touraine的作品，都挑出了一些程序化社会(programmed society)或后工业社会中社会运动的特征。当资讯的控制成为了社会力量的主要来源，可以预期冲突将从工作场域转移至像研究与开发、资讯的阐述、科学与科技，以及大众媒体等领域上。新冲突中核心的行动者不再是与工业生产相关，而是与认知与象征性资源的使用与控制相关。在当代社会中，投资个别(或独立)自动化行动中心的建立，与加强控制各种人类行动动机有着更紧密整合的需求，两者之间势必将有所冲突。虽然Touraine跟Melucci两人对于主要的社会冲突及其媒介都采取了一种复杂的观点，强调了称之为阶级意识发展的重要性，但却在「新社会运动」社会基础的实证研究之中，关注于抗议者们在社会中的阶级位置。随着一股对于部分运动及国家进行概括的倾向，研究指向一些中产阶级的位置，像是从事公共服务的白领族，比起像是蓝领族，更愿意去参与这类争论类型的活动。

> 阶级冲突的再现

尽管这些理论与实证式分析有助于阐明一些在世界的特定区域，与福利国家扩张的特定时刻下争议政治的某些特

征，但有关劳工冲突结束以及作为中产阶级舞台的预测，被证实是不正确的。

首先，不仅西方的资本主义形式不会被证明是一种其他经济体与社会走向的模式，甚至在这之中，会比程序化社会的理论家所预测的发展出更多剥削的形式。产业劳工数的下降不会导致劳工剥削的减少。相较之下，随着劳工状况的不稳定化(precairization)，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更是持续在受到关注，许多行业的自治权利、薪水，以及服务行业中白领阶级的工作都在减少。正如David Harvey参考了Karl Marx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为了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透过金融投机赚取获利已成为了通过生产赚取利润的替代方案。再加上扩张再生产的积累导向形式，将一部份的盈利重新投入再生产，通过剥削他人使资本积累增加，令人联想起那通过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关系扩张的原始资本累积方式。

围绕着工作条件重现的冲突所针对的是一些互相连结的问题，而Michael Burawoy分别将这些问题分类为反对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的社会运动(移除了已实现的社会保护)；反对新领域活动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社会运动；以及反对前商品化(ex-commodification)的社会运动，其中后者是定义为一种从市场驱逐的前商品。例如：从劳动市场驱逐的前劳工。如同累积资本的逻辑冲击了共同动员的形式，也考量到金融资本主义(financial capitalism)的特定特征增长了阶级

>>



于智利的抗议活动，2019年。来源：Diego Correa/Flickr. 保留部分权利。

分裂，我们可以期待抗议运动能够跟随于不同的逻辑发展。

> 晚期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冲突

除了对一连串社会形态的广泛趋势进行辩论之外，在注意新自由主义中阶级冲突的危机复甦时，还必须注意资本主义演变的中期周期性过程。Karl Polanyi在他的主要著作《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里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社会保障与自由市场之间有着双重的运动。作为第二次的巨大转变，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市场对社会极端支配的意识型态上，而不是在于市场的社会支配上。

然而，在Polanyi的运动

及反动运动(countermovements)中的共同趋势却镶嵌于不同种类且共存于同一历史期间的资本主义。首先，正如世界体系的研究方法指出，资本主义采取了多样的形式于它的核心(core)、半边陲(semi-periphery)、边陲(periphery)之中。一些劳工运动的研究曾批评过概化特定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al)于全球水平的趋势，也就是说西方世界中的产业劳工数量可能在下降中，但这并不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区域内的情况。第二，Peter Hall、David Soskice与其他学者曾指出几个具有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同资本主义变体，其中市场是互动与关系的主要成分，正与协调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反。最近的研究正在处理第二波巨变中资本主义

不同适应性下的变化，以及它在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中的危机。研究不满于其采取了不同的形态，与特定的特征、时间性有关，以及金融危机中的强度与政治对其采取的态度。在核心与边陲，如同Beverly Silver所描述，Polanyi式的为捍卫旧权利的阶级斗争，是以不同的方式与马克思类型的社会运动互动，挑战现存的生产体系。

> 社会运动的能动性(agency)

尽管这些批判政治经济(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内的回响为社会冲突的阶级基础提供了许多实用的见解，但是这些建立自发性组织与佔据制度性权力的各种社会团体的能力地位，却产生了

一些社会运动研究可能有助于解决的未处理疑问。而社会运动研究可以做到的，那就是阐述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或是反动运动，是如何透过能动性及一个广阔关系的脉络下被创造出来。在做到这一点时，就动员资源与自发性政治层面两者的作用而言，其可能有助于将阶级的分析脉络推离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的研究取径。

首先，尽管研究新社会运动的学者正在讨论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他们通常将注意力摆在冲突结构上的决定因素上，同时又强调身份过程的重要性。就这个意义上，他们反对并争论马克思主义中对结构主义的诠释，而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或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的研究取径能够有助于克服这一挑战。然而，这个过程中却没有对那些特定机构的发展，以及能够解释从结构到行动上转变的概念资源进行足够的研究。

在这一点上，新社会运动的研究取径所指出了一些要素，仍然与理解现代冲突相关。举例来说，知识控制的重要性对比了生产方式(means of production)的物质所有权的式微。抑或是在当今的动员里，在福利国家中以拒绝对于公众的等级制度(hierarchical)来支持平民百姓的定义仍有其重要性。而这并非偶然，在马克

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时期社会运动的最新分析之中，像是其中一位Colin Barker的著作，就广泛地参考了Melucci与Touraine的分析，尤其是他们强调了反抗论述的重要性，而这个论述奠基于激进需求的认知并克服具主导权的常识。同样地，对于争议政治的一连串研究，强调了抵抗资本主义的象征性及物质资源的累积作用，也强调了特定抗议手段的巩固、制度管道的稳定化，以及以及结盟与网路的作用。

从最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危机中的局势经济(conjunctural economic)与政治发展的型态与强度，都与争论的形式与强度产生了相关的影响。对于欧洲边陲地带社会运动的比较分析，挑战了劳工社会学与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普遍假设。这意即着当劳工有结构上的优势时，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s)会在这个富饶的时期开花结果。而经济成长意味着有更高的利润可以用于增加工资与税收，以支持社会福利政策的支出。这样的研究显示，越有这种危机的地方，特别像冰岛、希腊、西班牙这类的国家，越容易触发更高水平的社会活动。其中会出现新的行动剧本(repertoires of action)与新的组织形式、主张，甚至能够使人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尽管如此，对于具争议的行为者在富裕时期和危机时期所面临的不同挑

战进行反思仍有意义。正如一些针对劳工运动进行的研究指出，透过在抗议活动时创造的团结资源，确实可以克服危机。如同佔据广场的长期罢工、佔领工厂运动，或是失业者的示威游行都展现了反财政紧缩运动的抗争特性。而其确实也被分析为一种对危机的反应，创造了创新的思想与做法。在葛兰西(Gramsci)的「有机危机」(organic crises)中，即统治阶级的霸权(hegemony)危机指出，在某些政治与社会的条件下，地方的好战份子会聚集起来使社会运动的规模更大。

> 结语

总结来说，阶级的结构主义式观点容易忽略政治机会斡旋社会经济的影响与动员资源的过程，而这是社会运动研究所主要关注的重点。将社会运动与(批判)政治经济作连结，对于掌握社会运动的变化性、强度、时机至关重要。而这些社会运动在世界不同的地区中动员起来，在不同的时间性(temporalities)中反对新自由主义下资本主义的危机。为了达到这一点，社会运动理论应该多去参考对于资本主义转型的批判分析，以研究当前资本的累积以及剥削的过程。同时，资本主义结构上的转型分析也可以受益于社会运动理论：它引起了人们不满情绪下的动员。■

來信請至 Donatella della Porta
<donatella.dellaporta@sns.it>

> 向非洲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Samir Amin致敬

Vishwas Satgar,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经济与社会 (RC02), 劳工运动 (RC44) 研究委员会委员。



Samir Amin 于北京, 2016。
来源: Flickr. 保留部分权利。

Samir Amin于2018年的8月12日辞世。如果没有他的贡献, 20世纪的非洲就不可能完成这一段辉煌的历史。他一生学术的旅程穿插了几个建立现代非洲的重要事件: (1) 阿拉伯民族主义 (Arab nationalism); (2) 在非洲后殖民时期的转变, 这包括了非洲社会主义 (African socialism) 和科学社会主义 (scientific socialism) 的兴起; (3) 新殖民主义 (neocolonial) 下母国利用从属国对其的依赖性所进行的控制; (4) 结构性的调整背景下所导致的泛非主义 (Pan-Africanism) 失败还有冷战; 以及 (5) 全球化下非洲的塑成。Amin曾经经历过这些重大事件, 而他除了研究这些事件之外, 还明智地参与其中。

Amin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 (independent Marxist), 研究计划进程是以他关注于未开发理论与其机制的哲学博士论文 (1957) 为基础。劳资关系博士论文后来出版成《世界规模的累积—未开发理论的批评》(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一书。Amin是个超越一般常理的知识份子, 从不被既有的规则绑架。他是开拓许多理论的先驱, 这包括: 马克思主义 (Marxist theory)、世界体系分析、发展理论、全球地缘政治 (geopolitics) 的局面分析、策略建议, 以及不断地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案例。社会学界从Amin的学术贡献中获益良多, 除此之外也有许多领域也是从中获益, 像是:

经济学、国际关系、后殖民理论、发展研究, 以及许多各式各样的学科。在非洲的学术背景之下, Amin在非洲与他人联合创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委员会 (CODESRIA); 而在1973年他担任了其中的创立执行秘书。从这个机构诞生了至少三代的社会科学家, 对非洲社会科学组织的进程作出了重大的改变。

身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Amin并未臣服于学术的正统思想 (orthodoxy), 他研究马克思的方法是向马克思学习。马克思对他而言只是个出发点, 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回应当代的挑战」, 这需要对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以及历史唯物论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做出观念上的创新。关于这点, Amin并未以强调劳资关系的抽象定义来研究资本主义。对Amin而言, 这样的研究取径往往落入经济主义 (economism) 与阶段主义 (stageist) 的路径去处理边陲地带的进程议题, 也就是说「落后的边陲地带」必须赶上先进的核心地区。相对地, 他认为重要的是将资本主义思考为一个世界体系, 使其成为一个分析的基础单位, 但又同时拥有最高层次的抽象概念。而这需要对资本论有历史性的了解; 对现代的帝国主义有具体的分析, 以及局势分析 (conjunctural analyses) 的应用。最终, 这使得Amin开创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新观念, 将其应用于全球下的资本主义。他开创的观念包含: 帝国租金 (imperial rent)、不平等发展 (unequal development), 以及世界资本主义本身

存在的全球极化(global polarization)现象。他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全球化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其中有五种实践垄断资本的利器：大规模毁灭、科技、资金流动、地球资源以及通讯传播。从这种观点来看，边陲国家要「赶上」核心国家就是一场骗局。

全球化发展的当下，不论是全球南方或是全球北方的国家，都在努力应付着去殖民化所带来的难题。以此看来，Samir Amin对于非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non-Eurocentric Marxism)所付出的学术贡献是既重要又前卫。对于那些对去殖民化研究有热诚的人，他也给予了一些用来推翻马克思主义全属欧洲中心思想的对话基础与桥樑。Amin挑战了在欧洲中心主义当下的马克思，包括资本主义的史学史(historiography of capitalism)，以及西方的现代性(western modernity)。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官僚纳贡生产」(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的新概念，同时将这种概念类别运用到史实上列出一种历史序列，说明在过去欧洲如何做为前资本主义文明进程的边陲。欧洲是文明化的后进者，由于欧洲曾经历过多样的制度变化，从封建制度(feudalism)一直到资本主义，而这个过程破坏资本剩餘的集中，使得欧洲以我们所知的方式在发展。此外，欧洲不是因为白人优越(white genius)以及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才发展起来，而是有一些历史上的偶发事件牵连翻转了十六世纪的世界体系。Amin也借由处于资本主义边陲地带上的劳工与农民联盟的向心力，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其与经济主义的交叠模式。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与政治学上，不应小看无产阶级工人的政治作用力。此外，Amin早期的先见之作：Empire of Chaos (1992)，预示了美国领导的欧洲联盟以及日本会马不停蹄地扩张、复制其资本市场，更是强调了其为了去殖民化所需要履行的责任。

Samir Amin对于脱钩(delinking)的策略性观念，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autarky)无关，而是提供许多国家地区一个国家—人民计划的基础，确保当前有关主权的计划立基于去殖民化要求。因此对Amin而言，核心计划控制处于边陲地带的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Amin并不赞成调整全球垄断与中心化之间的关系。就他的观点看来，自由化所带来的像是控制、私有银行，以及全球农业等，全都不利于国家发展。

脱钩本质上是有关一个国家—人民的计划，其受到三种倾向形塑：国家极权论者(statist)、资本家(capitalist)、社会主义者(socialist)。Amin想像这些倾向会因阶级联盟(就边陲地带的劳工与农民联盟而言)支持与否而影响计划发展。在这些倾向之

间会彼此发生冲突、抵触、相互竞争，形塑出一个国家—人民计划的方向。从Amin对于脱钩概念的新观点看来，他清楚地说明出脱钩发生的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国家计划是否能满足人们需求这点至关重要，而这不应该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危及。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Amin在政治上明智地支持了土地均分者(agrarian)的观点，农夫、小农与消费者应有权控制食物体制。从1996年开始，一个拥有超过两亿会员同时为地球上最大的农民运动网路「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一直以来都站在提升粮食主权的最前线，去回应全球粮食体制下的垄断控制对人民带来的剥削。Amin相信了解粮食主权对于了解脱钩策略而言是必要的。粮食主权位于如此的架构上，对于生处于这个高温世界的我们而言，思考如何减碳也是相当重要的。

第二，脱钩发生必须在一个区域或子区域的范围。对Amin而言，国家像是一个脱钩发生的重要轨迹，而这必须建立在大型政经联盟建立关系的背景下。例如，在南非或西非，甚至是在整个非洲里。这种和谐的区域化安排也与建立内部必要的权力去控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相关。这代表着脱钩也与一般受统治阶级、全球垄断、美国为首领导的三巨头连动的全球化有关。

第三，脱钩也与世界体系中实现的脱离核心权力有关。这种观念与脱钩紧密结合，对于多中心世界(polycentric world)的事实承认相当重要。这样的想法期望权力能够透过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被重新分配。在Amin的年代，1955年至1975年期间，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对于实现这样一个多中心世界至关重要。然而，经历不结盟运动的失败以及第三世界团结上的消减，Amin在他的余年开始创立人民与劳工版本的第五国际(Fifth International)。Amin开始批评世界社会组织(World Social Forum)的能耐，同时寻找一个能成为国际团结的新基础。他的计划被严肃对待，与许多部份都有关连，包含了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右翼(right-wing)威胁、全球资本主义正在恶化的系统性危机，如气候变迁。

在非洲的背景脉络下，我们那些深晓Samir Amin并与他的思想对话进行思考的人，正因他的陨落而受到极大的挑战。Issa Shivji，一位领导非洲社会科学的学者，正是以这句话获得了这种真实感：「猢猻木已经倒了(A Baobab has fallen)」。■

来信请至 Vishwas Satgar
<Vishwas.Satgar@wits.ac.za>

> I. Wallerstein: 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知识份子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2018-2022),
Stéphane Dufoix, University of Paris Nanterre 及 Institut universitaire, 法国, ISA历史
学史 (RC08) 研究委员会委员。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位于圣彼得堡的欧洲大学, 2008。Alexei Kouprianov/
Creative Commons 摄。

在过去几个月,有许多事件重创了我们的社会学界。三位卓越的社会学家辞世:Immanuel Wallerstein、Aníbal Quijano、Erik Olin Wright。而国际社会学协会(ISA)特别地感谢曾在1994年至1998年担任过学会主席的Wallerstein。他是全四卷的著名杰作《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主流现代

化理论的世界体系分析,这种分析观点不论是在他开始创作的1970年代当时,或是到现代都是令人相当佩服。Wallerstein透过论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并不是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的自发性领域,以及要求所有的分析需要同时拥有历史性与系统性,他重新聚集了与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资本主义(capitalism)理论相关的社会学观点,建

>>

立反帝国主义(anticolonial)与后殖民社会学(postcolonial sociology)的理论基础。

他对机构所付出的极大贡献是在于「开阔」ISA。他开始了由会长寄信给成员的传统,建立了其与会员的直接联系;同时也组织了地区会议,以培育未来可以领导自己国家社会学发展或是领导ISA学界的社会学家。

Wallerstein的著作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证明了他的影响力遍及全球。在阿拉伯世界中,他的其中五本着作与一些文章已经过翻译,而他一位对于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ist)有所研究的朋友Samir Amin,誉他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这种情况真的是难以解析。乍看之下,在几本他重要的著作中,像是:《否思社会科学》(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1991),或是1996年他主持的古尔本吉安委员会(Gulbenkian Commission)里他对于重建社会科学的报告之中,会被他引用文献的非西方社会科学家非常少(Samir Amin先是被引用,而Engelbert Mveng较晚被引用)。然而,更密切地调查可以发现,他在宾汉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负责的费尔南德·布劳德尔研究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曾经是帮许多来自现代/殖民组织(Modernity/Coloniality group)的拉丁裔美国社会科学家(像是:Aníbal Quijano、Enrique Dussel、Walter D Mignolo、Ramón Grosfoguel),在1990年代为其提供一个避风港,让他们出产学术作品的一个地方。此外,在第十六届举办在蒙特娄(Montreal)的国际社会学大会前,他于1998年所作出的会长致词之中可以看见他第二次(总共六次)对于传统文化

社会学(culture of sociology)作出的挑战,其中详尽地引用埃及裔的法国社会学家Anouar Abdel-Malek(注一)的作品,去挑战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

早在1971年,Wallerstein就认为建立在十九世纪初的规训划分是「不再带来任何启发知识的效果(注二)」,也因此Wallerstein要求以人文与历史重新组织社会科学。他接受「理性涉及了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的选择,而知识份子的阶级角色是为了阐明我们历史上共同经历过的选择。」,并以此去推动社会科学的重建,就像他在《当我们知道世界的终点: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所说过的那样。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坚韧的理性」,社会科学将变得与社会失联。他在2019年1月的最后一段评论中,曾告诫我们没有人是局外人:「世界将可能走向歧途,也或许不会变成这样。在过去,我曾认为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是一段重要的抗争.....那些在未来会继续活下去的人可以做的是与他们自己抗争,如此一来改变将会成真。」

Wallerstein相信资本主义末期会带来的危机,然而这位杰出的学者却在我们实现更好的世界之前长远地离开了我们。■

注一:Wallerstein, I. (1999年1月):「社会学的遗产,社会科学的承诺」《当代社会学》(Current Sociology) 47(1): 1-37。

注二:Wallerstein I. (1971年11月):「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像社会学的东西」《美国社会学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6(4): 328。

来信请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Stéphane Dufoix <stephane.dufoix@wanadoo.fr>

> I. Wallerstein: 使社会学重新团结

Frank Welz,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澳洲, ISA社会学史 (RC08), 社会学理论 (RC16) 委员会委员,
Anand Kumar, Senior Fellow, 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New Delhi, 印度。

「他将他的首要任务置于成为一位积极参与的社会学家上,而这不仅是在作为一名研究员,更是在于成为一名社会学老师。」

反思2018年ISA世界大会「加拿大学者对于社会学的回顾」的一文中,Frédéric Vandenberghe及Stephan Fuchs曾经强调「社会学已经消失了。」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支离破碎的学科失去了自身的核心跟身份。在这世上,一直以来最反对社会学破裂与专业化的人就是Immanuel Wallerstein。他于2019年8月31日辞世,享寿88岁,他的离开对社会学界而言是一大损失。现在,一个重大的责任正传承到我们身上:一个全球的社会学家社群,但幸好这里有他留下的大量学术遗产。在1970年代被Immanuel Wallerstein的核心思想激励到后(此时Anand Kumar还正在宾汉顿大学接受他的指导),经过了长时间一连串的会议(在1999年我们在巴黎还一起对他进行视讯访谈(注一))。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从Immanuel Wallerstein的思想里,挑出几个我们觉得跟现代社会学最贴切的部分提出。

第一,有关分析的单位:国际社会学曾在这个新世纪之中谴责社会学的方法论国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像是U. Beck, D. Chernilo),然而Wallerstein却早已在1960年代,当他发现无法将后殖民时期的西非视为一种国族社会来,而只能将其当作的一块世界体系中的历史时,改变了他对部分社会科学的分析。这个想法的出发点就在于他创作出了全四册的作品「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二,Wallerstein在早期曾要求建立与我们理解社会的方式(认识论(epistemology))相关的社会科学,如今这个想法对社会科学而言是既重要又充满前途的挑战性。受到Ilya Prigogine复杂性科学(science of complexity)的启发,在1990年代Wallerstein开始争论,历史世界中对于不稳定态、演化论、波动性进行复杂研究所产生的均衡性(equilibrium)的新观点所建立的世界观,会取代强调重复性、稳定性的牛顿式世界观,透过这点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会在社会科学中开启知识的新领域(将社会学带回瞩目的焦点)。从这种观点看来,新古典主义学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对于均衡理论的判断将会是错误的。除此之外,

我们将经济(经济学)、政治(政治科学)和社会文化(社会学或人文科学)等领域分开的传统作法也是一种错误。分析一种现象必须连同其如何受到其他现象影响的相关形塑纳入考量。举例来说,种族因素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文化上从过去继承而来的关系,要知道的是其同时也是一种在社会中,上层向下层施压的策略方式,上层以此方式(经济上)组成了下层阶级,也使其形成(政治上)由下而上的抵抗模式(注二)。第三,在Immanuel Wallerstein强调社会学的认识论(epistemological)以及本体论(ontological)的假设背后隐藏的意义,就是他对于要增进我们社会学界团结与效率所许下的承诺。早在1990年代任职ISA主席时,他就批评过社会学界不断分裂成小团体的现状。唯一解决的方式只有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学界中共同分享这些知识资源。

最后,他将他的首要任务置于成为一位积极参与的社会学家上,而这不仅是在作为一名研究员,更是在于成为一名社会学老师。为了达成他的理想,他成为了一名「有机知识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并持续地参与为正义与和平发声的社会运动。从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到1970-1980年代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还有聚集了非洲、拉丁美洲学者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都能看见他的身影。简单来说,Immanuel Wallerstein将会被作为一位伟大的学者纪念,如此作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在1960年代时勇敢反抗「西方式社会学」的限制,更是建立一套新的观念、理论、研究方法(「世界系统」的研究途径)复甦了下半世纪的社会学,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动态变化——特别是在「漫长的十六世纪」以及那个充满动盪的二十世纪。■

註一:1999年Anand Kumar和Frank Welz 采访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49D592A64200367F>。

註二:Kumar, A. and Welz, F (2001) "Culture in the World-System. 采访 Immanuel Wallerstein. *Social Identit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7(2): 221-231。

来信请至:

Anand Kumar <anandkumar1@hotmail.com>

Frank Welz <frank.welz@uibk.ac.at>

> 移民露营车在中美洲的迁移策略

Veronica Montes, Bryn Mawr College, 美国



墨西哥城耶稣马丁内斯体育场的移民。
来源: Veronica Montes.

2019年5月的一个春日午后,我再次看见露西亚和赫克托,这是六个月来第三次见面。这次,他们是在美墨边境的提华纳(Tijuana)。露西亚和赫克托是数千名来自中美洲移民之一,他们于2018年10月或11月越过墨西哥领土,成为所谓的中美洲露营车的一分子。移民者使用这辆露营车作为到达美墨边境的一种迁移策略。2018年11月5日,这天是我第一次见到露西亚和赫克托,当时我在墨西哥城参观体育场,此体育场为露营车上数千名参与者提供庇护的地方,这群参与者是从11月3日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10月12日,第一辆露营车从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出发(2018年总共有四辆车),并于11月12日抵达墨西哥的提华纳。中美洲移民者为了要去美国而越过墨西哥的领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中美洲移民运动(MMM)的协调员玛尔塔·桑切斯·索勒(Marta Sánchez Soler)的说法,每天大约有八百至一千名中美洲移民进入墨西哥。据估计,如2014年,大约三十九万两千名中美洲移民越过墨西哥的领土,这一数字在2015年略为下滑,降至三十七万七千人。如果中美洲移民横渡墨西哥的领土不是一个新现象,那为什么移民露营车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

人权组织表明,大规模挟持绑架对在墨西哥的他国移民成为永久性且大规模勒索体系。玛丽亚·多洛雷斯·帕里斯·蓬波(María Dolores París Pombo)在她的《墨西哥的暴力和移民》一书中断言,在墨西哥南部与北部边界间的迁徙途径中,他国移民在犯罪与性交易市场中遭严重剥削。在这种背景下,成千上万来自中美洲的移民有名的策略是依靠其流动性,在墨西哥领土内旅行,借此让他们能够以安全、经济许可且快捷的方式到达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界。因此,尽管成立露营车队作为穿越墨西哥领土的机动性策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其综合的因素却与以往不同。首先,迅速加入露营车队的人数众多且有异质性,其包含年轻家庭、单亲家庭、年轻的单身男子、无人陪伴的未成年者、性少数以及大量的老人与残疾人士。第二,此组织发展很迅速。第三,有成千上万的中美洲人下定决心要通过主要干道,并要求他们有自由和安全过境的权利。

然而,为什么这群人要离开家园,并冒着家人的生命安全前往美墨边境呢?事实上,答案很复杂,因为每个中美洲地区的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国际救援委员会最近发表一份名为「设计混乱:美国在中美洲制造的紧急事件与实际危机」的报告来阐明导致移民的背景。该报告指



試圖讓移民了解自己的權利和選擇。
來源: Veronica Montes.

出，到达美国的萨尔瓦多庇护者带着严重的社会心理压力，其压力是世代相传，如家庭遭受数十年的内战、国家暴力、贫困、自然灾害以及最近遍及各地的帮派暴力。瓜地马拉也经历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脉络，从1960年到1996年总共进行36年的内战，死亡人数约为20万人，其中多数人为原住民后裔。而洪都拉斯的转折点则是高程度的政治腐败，2009年政变、极度贫穷与极端的帮派暴力导致成千上万的洪都拉斯人逃离自己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数百万中美洲人的生活变得极其危险且贫穷。

11月11日，来自第一批露营车队的300人陆续抵达提华纳。根据位在提华纳的研究机构北境学院(COLEF)的一份报告，估计约有六千人住在市政府提供的综合运动场。在12月13日公开的报告中，COLEF为在提华纳的中美洲移民讨论出五种可能的选择：(1)去美国寻求庇护；(2)在墨西哥申请难民身份；(3)留在提华纳并寻找工作；(4)自愿回国或强迫遣返其原籍国；(5)偷偷越过美墨边境。在此列表上，我加上第六种情况：搬到另一个美墨边境的城镇。最后一种选项正是卢西亚和赫克托的选择。第二次遇见露西亚与赫克托是在2018年11月下旬的提华纳，当时他们将离开提华纳前往塔毛利帕斯州的雷诺萨(1112英里的旅途，前往墨西哥最危险的边境城市之一)的数个礼拜前，他们希望能够在在那座城市获得建筑相关工作。

我们能够从2018年露营车队的行动获得一点教训。首先，作为一种流动性的策略，露营车队代表着成千上万中美洲人越过墨西哥领土的可见性，以及这群滞留在美墨边境的移民的隐藏性

之间的双重性。第二，虽然加入露营车队并集体动员是帮助人们到达美墨边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时至今日，随着人们分散到提华纳或墨西哥的其他边境城镇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时，集体动员也随之消失，这使露营车队的成员处于高度脆弱的处境。第三，露营车队向世界揭示中美洲地区存在的迁徙危机，跟据估计，到2019年底，到达美墨边境的中美洲移民人数可能达到100万。第四，因为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危机，墨西哥政府面临着复杂的困境，因为墨西哥南部边境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无法照顾成千上万的移民(来自中美洲、非洲人、古巴、海地或其他跨大陆移民)，这群人困在那里等待继续前往北部边界，同时，在墨西哥北方的边境，移民庇护所人满为患，成千上万的移民设法到达此地并等待着过境美国以寻求庇护，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秘密入境美国。最后，时至今日，成千上万的中美洲移民在墨西哥和美国都面临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得益于个人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怜悯、团结与同情心，这些人的支持与帮助让如露西亚和赫克托等人寻求更好的生活。■

来信请至: Veronica Montes
<vmontes@brynmaur.edu>

> 纽约州水牛城： 实践难民安置的典范

Aysegül Balta Özge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thnicity, Race and Immigr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美国, 迁徙社会学(RC31)

伊利县：2008年至2016年移民和难民来源国前14名

Country of Origin	Total Number (2008-2016)
Afghanistan	140
Burma	4,057
Bhutan	1,888
Burundi	79
Congo	56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958
Cuba	96
Ethiopia	77
Eritrea	321
Iraq	1,322
Iran	54
Somalia	1,851
Sudan	176
Syria	280

布法羅簡報，2018年2月，公益夥伴關係

自 1980年颁布《难民法》后，美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难民安置体系。国土安全部与国务院负责协调难民进入美国的手续，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难民安置办公室与九个志愿服务机构共同协调难民抵达后所提供的服务作业。在近几年川普总统大幅调降收容难民人数以前，美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每年接纳约九万名难民，而难民会被永久接纳并迅速获得美国公民身分，且与其他类型的移民身分不同，难民身分立即享有获得现金补助和医疗援助的资格，还有其他的公共福利。

> 为什么选择中小城市？

上文提及的九个志愿服务机构与国务院已经达成合作协议，而机构的代表也会经常开会来

审核每一个入境难民的案件。他们会考虑如美国已经存在的家庭体系、口译员的可用性、住房提供、英文等级与就业服务等因素来决定每个难民将安置在哪里。尽管纽约与洛杉矶等这种大城市是典型的移民目的地，但最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成为难民安置的首选，较小的城市比较能够负担难民，因为有更多閒置的住房，且许多城市因经济因素而需要增加劳动人口。

自2006年开始，越来越多的难民在纽约州的水牛城这座中型城市定居，尽管安置的过程在一开始就充满挑战性，但现在的水牛城已经成为优良的典范，此外，难民对这座城市的复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水牛城是铁锈带的典型城市，该地区位在美国中西部与东北部，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以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厂）闻名。因为去工业化、经济全球化与自动化，水牛城、辛辛那提、克里夫兰、代顿、底特律、匹兹堡与圣路易斯等城市大量失去居住人口，且经济产能不断下降。自1950年代开始，水牛城已经失去一半的居住人口，截至2018年7月，水牛城的人口估计为25.6万，且贫穷率高达30.9%。水牛城尼亚加拉大瀑布地区是美国种族隔离第八大严重的地区，城市与郊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不平等，与许多其他的铁锈带城市相似，水牛城现在正在经历的人口迁移，但这主要归功于移民和难民，若国外出生的人口没有增加，水牛城的总人口数在2000年至2014年之间的下降幅度将会是4.7%而非3.3%。

自2002年开始，已经有超过一万五千名难民安置在水牛城。然而，因为二次移民的关系，难民的数目应该更高：最初安置在其他城市的难民因为水牛城可负担的房租费用与较强的社区支持网路，而选择移居水牛城。排名前五大难民的母国为缅甸、索马利亚、不丹、伊拉克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移民与难民人口集中在水牛城的西

区,至2017年,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上升到16%。

> 谁是主要行动者?

水牛城的四个安置机构(天主教慈善机构、犹太家庭服务、最终旅途难民服务与水牛城国际协会)负责提供难民在美国头三个月的接待与安置服务。个案工作者在难民抵达前要先找公寓并提供家具,在机场接送他们,以他们的名义开设房屋基本水电设施,帮助他们获得公共援助与社会保险卡,协助难民的小孩入学,开设银行帐户,安排医疗预约,并教导他们如何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此外,安置机构有提供英语课程、就业与口译服务以及法律咨询。但是,安置机构没有从政府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提供90天以上的服务,他们期望在此期间结束时难民应能自给自足。

这四个安置机构并不是水牛城与难民合作的唯一行动者。还有其他的非营利组织,包括难民自身族裔/宗教社区组织、市长办公室、学校与大学,以及当地媒体,这些组织为水牛城的难民创造热情的环境。各行动者擅长不同的领域,彼此合作,并在能够为难民提供更好服务时推荐给他们,正因所有利害关系人有效的合作有助于使水牛城成为移民的典范。

难民不仅仅是需要被满足的人们而已;在适应新生活后,他们能够为社区做出重大的贡献。他们重新安置在较为空旷的社区与学校中,购置房屋并修缮,建立新的事业,维持劳动的生存能力并纳税。与许多振兴的铁锈带城市相似,在城市领导人与传播媒体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论述:难民对水牛城的复兴有利。当然,只有难民本身没办法拯救城市,还有如海滨开发计划与大学医院联盟,以及周围都会区与住宅重建等开发计划有所增加。然而,难民在水牛城西区因其在经济稳定和重建的角色而倍受赞誉,其提高社区的多样性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透过企业才能与当地的中小企业来促进经济的复兴。因此,铁锈带城市互相竞争以吸引更多的难民。

> 面临什么挑战?

尽管各团体展开合作来满足难民的需求,并在水牛城进行城市复兴(也称为「难民复兴」),但融合的过程仍存在众多挑战,这都是国家与地方层面的结构性问题。首先,为难民安置机构提供

的资金仅限难民移入的前九十天,并期望难民能够在此阶段结束后能够自给自足,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去年允许入境美国的难民人数上限已降至三万人,而今年更降至一万八千人,这导致预算更进一步削减。去年,难民安置机构进行大规模的募款活动,纽约州政府为整个纽约的难民安置机构募款两百万美元,但这个计划的未来尚未明朗。面对难民人数的降低与联邦资金的削减,城市领导人警告,水牛城的经济增长将面临威胁。第二,在川普总统下达旅行禁令后,我在水牛城采访的叙利亚难民都表达出恐惧和焦虑。尽管他们告知说他们并没有在水牛城当地遭受任何负面的举动,但新闻中的恐惧伊斯兰与反难民言论导致归属感的降低。当难民感到不受欢迎时,他们就不太可能融入社会。

此议题在地方层面,则面临更多样化的挑战。水牛城是一个高度隔离的城市,难民通常被安置机构安置在西区。然而,难民通常从事的工作(例如洗碗工、清洁工、厨师、包装工、装配工与材料搬运工)却不在西区。在他们买得起汽车前,他们多仰赖大众交通工具,而大众交通工具并不普遍且不可靠。公共援助的资金通常不足以养活难民自身,因此他们可能会运用不规律的时间从事多个兼职的工作,却使他们无法规律的上英语课程;而大多数难民家庭无法负担育儿照护服务的费用,除非有其他家庭成员照料幼儿,否则育有孩子的妇女无法上英语课程或上班,这导致妇女在家中与世隔离,并阻碍她们在社会与经济层面上的融合。最后,许多社区领袖指出水牛城本地出生的人民对难民认知并不多。正因为族群融合是一条双向道,目前难民仍不足以充分理解美国的生活模式并试图去适应。

安置世界上少数的弱势难民不仅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也使接纳难民的城市更为丰富并协助城市的发展。纽约州在安置难民上排全国第三,且水牛城安置难民的人数为纽约州中第一。水牛城在过去十五年积累的经验使其成为其他城市的优良实践典范。■

来信请至 Ayşegül Balta Özgen
<vmontes@brynmawr.edu>